

资讯信息 仅供参考

高教决策参考



2025 | 12

第2卷第12期

总第23期

上海师范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

目录

高教动态	1
教育部公示 拟同意设置 32 所“新大学”	1
华中师范大学发起智能时代全球教师发展倡议	2
以技术创新推动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2025 世界数字教育大会高等教育平行会议观察	3
美国宾州州立大学分校关闭计划引发争议：财政紧缩与公共使命的冲突	4
欧盟高等教育一体化迈出关键步伐：欧洲联合学位制度框架正式确立	6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清华大学联合召开教育强国建设研究工作推进会	7
上海市高等教育学会国际交流专业委员会成功召开 2025 年高校中外合作办学转型发展研修会议	9
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实验室联盟会议在武汉大学举行	11
首届全国高校教师数智教育创新大赛全国总决赛在武汉举行	11
同济大学聚焦“工程智能”成立五大研究院	12
北京理工大学人工智能学院成立	15
安徽师范大学等三方联合成立“AI+高等教育研究院”	16
高教研究	17
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与高等教育结构优化 胡娟 程鑫	17
文明的对话：对高等教育国际化的重审与前瞻 许美德 吴寒天 刘继安	18
教育强国建设背景下高校教学的数字化转型：形态、困境与进路 洪志忠 罗霞	26
高等教育数智化的价值向度、主要特点及实现路径 张继平 徐心如	26
数字时代重申文科教育的重要价值 郭成 王建华	37
生成式人工智能视域下高校文科教学的伴生性风险与防范 金华 王汉英	38
智能体赋能高等教育变革：基于 DEEPSEEK-R1 的范式重构与“浙大先生”实践探索 陈默 杨玉辉 杨清元 等	38
从“AI 排斥”到“AI 创能”：人工智能在大学教学中的应用深化 黄巨臣 王一栋	39
中国交叉学科：发展脉络、基本特征与建设策略 钱佳 黄启兵 田晓明	39



他山之石	40
重塑英格兰高等教育生态系统：整合、灵活性与协作式可持续发展 [英]马克·莫林	40
国际视域下交叉学科博士生培养：困境、纾困与启迪 闫广芬 杜剑涛	42
向数字契约迈进：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推动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的价值理念、行动机制与实践经验 阚阅 刘林佳	42
增进高等教育机构的数字福祉：英国数字能力框架研究 阚阅 卢宇峥	43
日本数字人文教育的经验与启示研究 石亮亮	43
政策工具视角下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的路径研究——以哈萨克斯坦为例 梅伟惠 马雪梅	43
虚拟国际化：数字时代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新方向 段世飞 钱跳跳	44



高教动态

教育部公示 拟同意设置 32 所“新大学”

5月22日，教育部官网发布《关于拟同意设置本科高等学校的公示》。教育部拟同意设置安徽第二医学院、天津警察学院、芜湖职业技术大学等32所学校，现予公示。

关于拟同意设置本科高等学校的公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普通高等学校设置暂行条例》《普通本科学校设置暂行规定》《本科层次职业学校设置标准(试行)》等有关规定以及第八届全国高等学校设置评议委员会考察评议结果，经教育部党组会议审议，拟同意设置安徽第二医学院等32所学校，现予公示。

公示时间为2025年5月22日至5月28日。期间，如对设置学校有不同意见，请署名向我们反映。

通信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大木仓胡同37号，教育部发展规划司，邮编：100816

传真：010-66020442

电子邮箱：ghsszc@moe.edu.cn

附件：拟同意设置本科高等学校名单

教育部发展规划司

2025年5月22日

名单如下

拟同意设置本科高等学校名单

序号	设置事项	申报省份	办学性质
1	设立安徽第二医学院	安徽省	公办
2	设立抚州医药学院	江西省	公办
3	设立天津警察学院	天津市	公办
4	设立曲靖健康医学院	云南省	公办
5	南昌工程学院更名为江西水利电力大学	江西省	公办
6	新乡医学院更名为河南医药大学	河南省	公办
7	吉林化工学院更名为吉林化工大学	吉林省	公办
8	天水师范学院更名为天水师范大学	甘肃省	公办
9	设立芜湖职业技术大学	安徽省	公办
10	设立安徽职业技术大学	安徽省	公办
11	设立宁夏职业技术大学	宁夏回族自治区	公办
12	设立宁夏工商职业技术大学	宁夏回族自治区	公办
13	设立陕西农林职业技术大学	陕西省	公办
14	设立成都航空职业技术大学	四川省	公办
15	设立苏州职业技术大学	江苏省	公办

16	设立扬州职业技术大学	江苏省	公办
17	设立无锡职业技术大学	江苏省	公办
18	设立杭州职业技术大学	浙江省	公办
19	设立宁波职业技术大学	浙江省	公办
20	设立呼和浩特职业技术大学	内蒙古自治区	公办
21	设立内蒙古建筑职业技术大学	内蒙古自治区	公办
22	设立兴安职业技术大学	内蒙古自治区	公办
23	设立本科层次黎明职业大学	福建省	公办
24	设立广州职业技术大学	广东省	公办
25	设立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大学	广东省	公办
26	设立顺德职业技术大学	广东省	公办
27	设立甘肃工业职业技术大学	甘肃省	公办
28	设立武威职业技术大学	甘肃省	公办
29	设立贵州轻工职业技术大学	贵州省	公办
30	设立铜仁职业技术大学	贵州省	公办
31	设立山西文化旅游职业大学	山西省	公办
32	绍兴文理学院元培学院转设为绍兴理工学院	浙江省	公办

（来源：教育部官网）

华中师范大学发起智能时代全球教师发展倡议

5月15日，在2025世界数字教育大会智能时代教师角色转变与能力提升平行会议上，华中师范大学发起“智能时代全球教师发展倡议”，倡导以数字技术赋能教师专业成长，促进教育公平与质量提升。

新一轮科技革命推动经济社会数字化转型，对教师人机协同教学、数字伦理判断等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人工智能推动教育全面转型，迫切需要教师队伍加快实现角色转型与能力升级，以适应智能技术与教育深度融合的时代趋势。

为此，华中师范大学发起如下倡议：

一是把握时代机遇，积极拥抱人工智能。深刻把握数字化、智能化融合发展的契机，做人工智能时代教育变革的先行者、技术赋能的实践者、融合创新的开拓者。

二是优化支持体系，提升教师数字素养。共建全球教师发展平台和智慧教师助手，整合智能教学设计、数字化教学法、跨文化协作资源，通过常态化数字素养跟踪评价与数据驱动的技术资源适配应用，培育推进人工智能与教育深度融合的教育主力军。

三是深化技术运用，赋能教师教学创新。深入推动人工智能赋能教育变革，开展“人工智能+课堂教学”创新实践，推动人工智能技术融入教育教学全要素、全过程，形成具有本土特色、可复制、可操作的人工智能教学应用创新案例。

四是凝聚全球合力，促进教师协同发展。携手构建开放、共享、协同的全球智能教育教师共同体，发挥各国人工智能教育研究与实践的独特优势，推动优质资源与成功经验的跨国

界流通与共享。

五是强化智能向善，筑牢教育安全防线。坚持以人为本，秉持教育初心，强化价值观引导与情感性联结，确保人工智能服务人的全面发展。积极应对潜在的风险和挑战，构建人工智能伦理教育体系，提升在数据使用、人机协同中的伦理判断能力。

（来源：中国教育新闻网）

以技术创新推动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2025世界数字教育大会高等教育平行会议观察

5月15日下午，在由教育部高教司指导、武汉大学承办的2025世界数字教育大会高等教育平行会议上，同济大学以一段未来课堂展示让与会中外嘉宾直观感受大学课堂的数智化样貌。

本次平行会议以“智慧教育：高等教育教学体系重塑与超越”为主题，全球近150位政府机构、国际组织、高校和在线教育机构的代表参加。高等教育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发展的思考在此碰撞，共识在此凝聚。

共识：数智化成为高等教育发展新引擎

加快推动高等教育数字化发展、打造智能时代高等教育新形态，是中国推动高等教育综合改革的关键一招。对于世界各国来说，高等教育都是教育发展的重中之重。当下，各国也纷纷选择将数字化、智能化作为推动高等教育转型发展的引擎。

希腊教育、宗教事务和体育部高等教育副部长尼科斯·帕帕约安努认为，要将数字变革视为一项可持续的使命，而不是阶段性的项目。

对于以数字化、智能化赋能高等教育的具体目标，武汉大学党委书记黄泰岩指出：“如何以技术创新为手段，推动教育高质量发展，让数字教育成果更多惠及各国人民，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社会文明进步，既是高等教育必须回答的时代命题，也是世界各国推动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应有之义。”

行动：数智化加速融入高等教育各领域

清华大学是中国最早开展数字化、智能化转型的高校之一，2013年就启动了慕课教育。2023年起，依托在人工智能领域多年积累的研究优势，清华全面推动AI赋能人才培养。

“我们发现，AI在即时答疑、促进知识点掌握方面展现出优势，但在价值观引导、情感

交流和复杂问题思辨等方面，教师所发挥的引领作用依然无可替代。”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校长李路明说，“这迫使我们深入思考和探索技术赋能与提升大学自身价值的融合问题。”

当前，AI 在智商（IQ）上取得显著进展，但在情商（EQ）上仍然存在不足，这限制了有效的人机交互协同。澳门大学校长宋永华介绍，澳门大学在 AI 研究中融合认知科学、神经语言学等，尝试开发能够识别、理解、模拟和调节人类情感的智能体。

在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的发展战略中，AI 居于重要位置。该校副校长丽莎·赞贝兰介绍，2025 级学生将在入学第一天起就接触 AI 素养课，同时学校开发了针对教职员工的系列 AI 专业发展项目 and 实践型工作坊。

助教、助学、助管、助研，在 AI 助力下，全球高等教育新范式正在加速涌现。

反思：呼吁全球合作共同应对数智化挑战

风险与红利并存，挑战与机遇伴生。在积极拥抱数字化、智能化变革的同时，各国高校并未忽视对技术陷阱的反思。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副校长莫惠钊介绍，为了保证 AI 在教育过程中的正向使用，该校坚持 3 项原则：教师使用 AI 评估学生时，须告知学生算法介入的环节，并保留人工审核的最终裁决权；学生使用 AI 时须进行申报备案以确保数字诚信；所有教育类 AI 须通过教学增效与伦理风险的收益比评估。

AI 的强大学习能力使不少人陷入“本领恐慌”，对此，联合国前副秘书长法布里奇奥·霍克希尔德表示，AI 时代应注重培养学生的 3 项能力：一是全球视野，要提高学生对全球趋势的认知；二是人类更有优势的能力，如判断力等；三是对未来持续而复杂变化的适应能力。

多国与会代表呼吁，面对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全球国际组织、各国政府、高校、企业需要携起手来，共同推进高等教育数字化、智能化改革发展。

（来源：《中国教育报》2025 年 5 月 18 日 第 2 版 版名：新闻·要闻）

美国宾州州立大学分校关闭计划引发争议：财政紧缩与公共使命的冲突

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Penn State）正面临其历史上最具争议的改革决策之一。校方计划关闭 19 个联邦校区中的 7 个，以应对过去十年间持续恶化的入学率危机和财政压力。这一

提案由校长妮莉·本达普迪 (Neeli Bendapudi) 主导, 并已进入董事会表决阶段, 但遭到教职工、立法者及部分董事会成员的强烈反对, 质疑其决策透明度和对公立教育使命的背离。

根据校方披露的数据, 拟关闭的7个校区 (杜波依斯、费耶特、蒙特奥托、新肯辛顿、申南戈、威尔克斯-巴里和约克) 近年入学率锐减, 自2014年秋季以来平均下降超40%。截至2024年秋季, 这些校区共有约3,200名学生, 最小规模的申南戈校区仅招收309人。校方在143页的评估报告中指出, 这些校区普遍面临设施维护积压、财政赤字和宿舍空置率过高等问题, 需至少2亿美元资金投入才能维持基本运营。本达普迪强调, 关闭计划是“艰难但必要的”, 旨在确保大学长期可持续发展, 并将分两年逐步实施, 最早于2027年春季学期完成过渡。

然而, 反对者认为校方决策过程仓促且缺乏透明度。董事会成员杰伊·帕特诺 (Jay Paterno) 联合四名同事公开质疑, 指出目标校区运营成本仅占全校预算的0.5%, 且校方未充分探索募资或创新模式挽救校区。帕特诺批评行政团队仅提供“维持现状”与“全盘关闭”两个极端选项, 忽略中间可能性, 并呼吁推迟表决以争取外部资金支持。此外, 校方需将关闭计划提交宾州教育部长审批的流程, 也被视为可能延缓决策的关键环节。

教职员工的担忧聚焦于工作保障与教育公平。一位匿名的威尔克斯-巴里校区教员指出, 校方近年持续削减联邦校区经费, 却斥资7亿美元翻新主校区体育场馆, 暴露资源分配优先级失衡。这种矛盾在乡村社区引发强烈反响, 州众议员查里蒂·格里姆·克鲁帕 (Charity Grimm Krupa) 斥责关闭费耶特校区的决定“背离土地赠与使命”, 实质剥夺农村学生的受教育机会。共和党州参议员米歇尔·布鲁克斯 (Michele Brooks) 则透露, 部分董事私下承认决策流程存在缺陷, 敦促校方重新评估方案。

支持关闭的一方强调人口结构变化的不可逆趋势。宾州高等教育系统近年已有四所院校停办, 主因适龄学生数量缩减与运营成本攀升。校方数据显示, 7个待关闭校区中, 5个位于人口持续外流的农村地区, 其新生注册量已无法支撑“符合宾州品牌”的校园体验。本达普迪表示, 重组后将把资源集中于主校区和剩余12个联邦校区, 通过在线教育衔接受影响学生。但反对者质疑, 缺乏实体校区的在地服务将加剧乡村教育荒漠化。

争议背后折射出美国公立大学系统在财政压力与公共责任间的深层矛盾。作为州附属机构, 宾州州立大学享有运营自主权, 但每年仍接受约2.5亿美元州政府拨款。部分议员暗示可能重新审视这种半公立地位的资金机制。与此同时, 教工群体正通过“宾州教工联盟”发起工会化运动, 抗议管理层在闭校决策中排斥基层参与的治理模式。随着董事会表决临近, 这场围绕高等教育使命与生存逻辑的辩论, 或将成为重塑区域性公立大学发展路径的典型案

例。

（来源：高等教育内幕（Inside Higher Ed）官网）

欧盟高等教育一体化迈出关键步伐：欧洲联合学位制度框架正式确立

欧盟理事会于 2025 年 5 月 12 日通过两项关键文件——《关于欧洲高等教育质量保证与认可体系的建议书（Recommendation on a European quality assurance and recognition system in higher education）》和《关于联合欧洲学位标签及未来联合欧洲学位步骤的决议（Resolution on a joint European degree label and the next steps towards a possible joint European degree）》，旨在通过强化跨国合作和统一标准，提升欧洲高等教育的全球竞争力与吸引力。这两项文件共同构建了欧洲高等教育改革的战略路径，其核心内容包括联合学位标签的阶段性实施框架、质量保障机制的优化及欧洲高等教育一体化的长期愿景。

联合欧洲学位标签的三阶段实施框架

决议明确了实现联合欧洲学位标签并探索联合学位的三阶段计划：

准备阶段（2025–2026 年）：设立政策实验室（Policy Lab），由成员国代表与欧盟委员会协作制定标签的标准化框架，包括定义、标识设计及合规验证流程。同时要求成员国全面实施博洛尼亚工具（如 ECTS 学分体系、文凭补充文件），为跨国合作奠定基础。

实施与评估阶段（2026–2028 年）：正式推行联合学位标签，监测其可行性及对政治、法律和行政的影响。欧盟委员会将支持高校开展试点项目，评估标签对提升跨国合作、学生流动性和学位互认的潜在价值，并同步开展联合学位的可行性研究。

决策阶段（2029 年）：基于前两阶段的评估报告，理事会将决定是否推进联合学位的正式引入，确保决策基于证据并兼顾成员国的多样性需求。

质量保障体系的协同优化

建议书强调质量保障是联合学位标签与未来联合学位实施的核心前提，提出以下关键措施：

灵活性与国际化：优化质量保障流程以适应绿色与数字化转型需求，推动高校通过毕业生追踪（Graduate Tracking）和欧洲高等教育观察站（EHEA Observatory）数据提升教育质量。

跨国合作简化：鼓励成员国采用《联合课程质量保障欧洲方案》（European Approach），减少重复认证负担，支持高校联盟（如“欧洲大学”计划）探索联合内部质量保障机制。

自动互认机制：强化学历与学习成果的自动互认，要求高校遵循《欧洲数字化学习凭证标准》(EDC)，确保透明度并减少行政障碍。

联合学位标签的授予标准

联合学位标签的颁发需满足两大类标准：

课程组织标准：包括至少两个欧盟成员国高校的合作、联合课程设计与实施、符合欧洲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标准(ESG)、学生流动性要求(如硕士生需完成30 ECTS学分流动)及论文的跨国共同评审。

欧洲维度标准：涵盖跨学科研究、数字技能培养、多语言能力、包容性政策、环境可持续性以及对欧洲价值观(学术自由、民主公民意识)的承诺。标签仅授予完全符合标准的课程，并由欧盟注册的质量保障机构或高校自主认证(需经内部审核)。

联盟合作与创新驱动

文件特别关注高校联盟在推动一体化中的作用，提出探索“联合质量保障框架”试点，允许联盟通过单一外部评估覆盖全部联合课程，取代多国重复认证。此举旨在降低行政负担，同时确保教育质量与欧洲标准的统一。例如，成功通过评估的联盟可自我认证课程并直接使用联合学位标签。

此次改革呼应了欧盟委员会2024年3月提出的高等教育一揽子计划，意图通过深化合作应对地缘政治挑战与技术变革。决议与建议书的通过标志着欧洲高等教育从松散合作向系统性整合的转型，其核心目标是通过标准化标签提升欧洲学位的国际认可度，吸引全球人才，并为未来可能的“欧洲联合学位”铺平道路。

欧盟理事会通过上述框架，展现了在尊重成员国教育主权的的同时推动一体化的决心。联合学位标签不仅是质量与欧洲价值观的象征，更是构建“欧洲教育区”的关键步骤。其实施效果将直接影响欧洲高等教育在全球创新与人才竞争中的地位，为2029年后可能的联合学位制度提供实践基础。这一进程的成功，依赖于成员国、高校与利益相关方的协同合作，以及在灵活性、包容性与卓越性之间的持续平衡。

(来源：欧盟理事会(Council of the EU)官网)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清华大学联合召开教育强国建设研究工作推进会

5月17日，由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与清华大学联合主办的教育强国建设研究工作推进会在北京召开。教育部党组成员、副部长熊四皓出席会议并讲话。学会会长林蕙青主持会议。

清华大学党委书记邱勇致辞。学会老会长周远清、瞿振元，副会长管培俊、严纯华、张大良、邬大光，副会长、秘书长李楠，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郭鹏、社会科学司司长王日春、综合改革司副司长高庆峰、高等教育司副司长武世兴，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党委书记、院长李永智，教育部学生服务与素质发展中心党委书记、主任刘玉光、副主任唐小平出席会议。

会议指出，学会作为高等教育学术共同体、教育部直属高等教育国家智库、党和政府联系高等教育战线的桥梁纽带，开展了一系列力度强、见实效的高等教育研究，取得了资政建言、理论创新、舆论引导的良好效果。以有为公转带动有效自转，已经成为学会的发展理念和自觉行动。面向未来，学会要强化高等教育研究，更好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一是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教育强国的重要意义。要增强思想引领，夯实理论武装，认清形势变化，找准研究定位，把握重点方向，明确任务目标。二是要聚焦重大问题，着力加强对教育强国建设的战略支撑。要聚焦教育强国根本问题，聚焦教育强国战略必争，聚焦牵一发动全身的 reform 难题，持续加强研究力度，打造战略引领力量。三是要创新研究模式，持续完善教育战略研究的机制保障，强化统筹布局，加强过程管理，聚合各方力量，推动应用转化。中国高等教育学会高等教育强国建设研究中心要着力打造新型高端智库网络，组织和带动高等教育战线开展研究，以工作实效服务教育强国建设。

林蕙青强调，本次会议是贯彻落实教育部党组要求的具体行动，主要任务是进一步深入学习领会全国教育大会、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及三年行动计划有关精神，系统部署学会高等教育研究下一步工作。在学会第八届第十次会议上，确立了“政治建会、学术立会、开放兴会、贡献强会”的办会宗旨，提出“举旗帜、建体系、引风尚、出成果”的高等教育研究工作主题主线。学会将以高等教育强国建设研究中心为重要支点，团结凝聚广大高等教育研究同仁，为教育强国建设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学会将不断完善“教育部党组有部署，业务司局有要求，学会系统有行动，服务强国见成效”的工作机制，形成研究转化落地的闭环。

邱勇表示，教育强国建设已进入关键攻坚期。高等教育要准确把握新的时代使命，进一步加强系统研究，深刻理解推进教育强国建设应有的“六力”和需要正确处理的“五个重大关系”的科学内涵。要构建科学完善的指标体系，建立以质量、贡献为导向的评价体系。要把深化改革作为强大动力，坚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全面提升学校治理水平。清华大学高度重视高等教育研究，将继续以实干担当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创新，为教育强国建设提供服务支撑。

管培俊在工作报告中强调，高等教育强国必然是高等教育研究的强国。学会要勇担使命、主动作为，以更高质量的研究成果服务国家战略需求，更好助力教育强国建设。一要高举服

务教育强国建设旗帜,深化高等教育研究。坚持鲜明的政治方向,创新的价值导向,服务的根本宗旨。二要构建完善协同创新体系,强化有组织科研。建机构强组织,聚合力强队伍,重协同强合作,创机制强实效。三要引领言之有物学以致用学术风尚,转变研究范式。更加强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更加强“两个结合”,更加强用事实和数据说话,更加强调良好学风和学术生态。四要产出高质量创新成果,服务改革发展实践。遵循规律注重科学性,有效管用强调实践性,面向未来突出创新性。要为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聚合、激活、添动力,奋力谱写高等教育研究新篇章,为加快教育强国建设作出新贡献。

会上,成立了中国高等教育学会高等教育强国建设研究中心。林蕙青为中心主任管培俊,顾问周远清、瞿振元颁发聘书。

会议发布了服务教育强国建设研究课题,这是高教学会服务教育强国建设研究的首批课题。本次发布的课题分为三类,一是学会重大课题,其中包含“中国高等教育年度发展报告”和“高等教育发展指数研究”。二是政府委托重点课题,分为“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研究”“学生服务与素质发展研究”两个专项。三是学会与地方联合课题,学会与北京、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河南、广东、重庆8家省级高教学会共同发布10项研究课题。

会议围绕深入贯彻落实《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和三年行动计划,邀请教育部发展规划司、综合改革司、高等教育司负责人和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负责同志围绕司局重点工作和如何开展有组织科研作报告。瞿振元以《高等教育强国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为题作专题报告。学会学术发展咨询委员会副主任张炜、谢维和,副主任兼秘书长马陆亭,副秘书长郝清杰等出席会议。来自全国百所高校教育学部(研究院、高教所)负责同志、高等教育领域知名专家学者、学会学术发展咨询委员会委员等150人参加会议。

(来源: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微信公众号)

上海市高等教育学会国际交流专业委员会成功召开 2025 年高校中外合作办学转型发展研修会议

为推进高校新时期中外合作办学高质量转型发展,4月28日至30日,由上海市高等教育学会主办,上海市高等教育学会国际交流专业委员会承办,上海理工大学、上海应用技术大学、上海建桥学院、上海洛桑酒店管理职业学院协办的“2025 高校中外合作办学转型发展研修会议”在上海美臣大酒店成功召开。

上海市高等教育学会常务副会长汪歙萍、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国际交流处处长周勤健、上海市高等教育学会国际交流专业委员会主任陈青长、教育部以及来自全国 40 余所高校中外合作办学专家共 40 多人参加了会议。会议由国际交流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王武东以及执行副秘书长徐璟玮主持。

汪歙萍在致辞中代表上海市高等教育学会对来自全国各地的中外合作办学专家表示欢迎,对上海市教育委员会长期以来对上海市高等教育学会的大力支持和指导表示感谢。她表示,上海市高等教育学会国际交流专业委员会将在上海市教委国际交流处的指导下,紧密围绕服务国家战略和服务高校国际化发展开展工作。她希望通过本次会议搭建高校间的学术交流平台,加强高校间的交流沟通,互相学习借鉴中外合作办学的创新工作思路和优秀经验做法,共同谱写新时期高校中外合作办学高质量发展的新篇章。

周勤健作“教育强国背景下的高校中外合作办学”主旨报告,深入浅出地解读了教育强国背景下的高校中外合作办学的重要意义与实现路径。他表示,中外合作办学在向高质量发展迈进的进程中,应继续发挥国际化办学的独特功能,在学科建设、专业认证、师资队伍、科学研究以及人才培养的主体办学中发挥国际交流与合作的支撑作用,充分发挥学校的学科专业特色和充分利用已有资源和平台,进一步探索中外合作办学的新路径和新模式,努力服务国家战略,提升学校国际化办学水平和办学层次。

专家报告环节,上海大学悉尼工商学院党委书记吕康娟、教育部中外合作办学评审与评估专家郭强、上海交通大学密西根学院党委书记杨明、上海理工大学教务处处长单彦广、上海洛桑酒店管理学院执行院长胡笑寒分别以“中外合作办学转型发展及组织创新管理”、“高校中外合作办学规划、申请与评估”、“中外合作办学高质量师资队伍建设”、“中外合作办学与高水平专业国际认证”、“中外合作办学与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建设”为主题分享了中外合作办学经验与思考,并围绕大会主题共同探讨了中外合作办学转型发展面临的新形势、新机遇、新挑战与新使命。与会专家赴上海理工大学中英国际学院和上海洛桑酒店管理学院开展了实地参观、交流与研讨。

本次研修会议进一步加强了中外合作办学领域高校间的交流学习,互相借鉴了关于中外合作办学先进的经验与做法,拓宽了中外合作办学工作的思路和视野,为推进高校在教育强国背景下实现中外合作办学高质量转型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

(来源:上海市高等教育学会微信公众号)

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实验室联盟会议在武汉大学举行

近日,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实验室联盟第二届会议在武汉大学举行。武汉大学校长张平文院士、湖北省社会科学院院长黄学龙、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姜国华等人,以及来自30家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实验室的专家学者共200余人参加会议。

张平文致辞指出,本次会议聚焦“数智时代哲学社会科学与人类文明新形态”,研讨如何有效提升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在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方面的能力,致力于加快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他对实验室联盟的建设发展提出三点期望:一是推动资源整合与协同创新,构建资源共享体系;二是培育交叉人才,加强合作交流;三是深化成果应用与社会服务赋能,搭建产学研用一体化转化平台。武汉大学将以此次会议为契机,与各成员单位携手,共同推动哲学社会科学实验室在数智时代实现新跨越,为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术体系贡献武大力量。

黄学龙表示实验室是哲学社会科学创新的重要平台和基地,也是完善体制机制创新环境的关键载体,数字化背景下哲学社会科学的创新发展需结合移动互联网和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的新形势。

姜国华指出,文科实验室建设要具备回馈时代需求的使命担当,要坚持以加强协同合作为发展路径,要以服务中国式现代化为目标,积极适应新质生产力发展要求。

大会还设置了5个平行论坛,会议期间召开了实验室联盟工作会议。

(来源:中国教育新闻网)

首届全国高校教师数智教育创新大赛全国总决赛在武汉举行

近日,首届全国高校教师数智教育创新大赛全国总决赛在武汉大学举行。比赛聚焦“创新引领,智驭未来——深化数智教育教学实践,领航数智创新人才培养”主题,旨在为高校师生搭建开放共享、交流互鉴、合作共赢的开放式平台,推动数智技术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助力高校教师探索教学新模式,培养具有数智思维和创新能力的复合型人才。

本届大赛分为3个赛道:数智赋能教学应用、数智赋能校企合作、数智赋能实践教学。大赛吸引了全国110所高校的431个教师团队参赛,覆盖全部学科门类,参赛教师及团队成员共计1566人。经过校赛、全国初赛的激烈角逐,最终来自40所高校的60门课程脱颖而出,入围全国现场决赛。决赛现场设置直播观摩室及线上直播通道,供全国教师学习交流,

进一步扩大赛事影响力。

大赛评选出特等奖 10 项，一等奖 34 项，二等奖 87 项，三等奖 132 项，优秀组织奖 16 项。该校教发中心常务副主任陈学敏表示，本次大赛是高校教师探索教育数字化转型的重要契机，不仅为教师提供了展示与交流的平台，更为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对促进教师数智教学、培养具有数智素养的拔尖创新人才大有裨益。

据悉，首届全国高校教师数智教育创新大赛由武汉大学主办，武汉大学教师发展中心承办。

（来源：中国教育新闻网）

同济大学聚焦“工程智能”成立五大研究院

5 月 20 日，同济大学举行人工智能赋能学科创新行动发展大会，聚焦“工程智能引领，新域新质发展”这一主题。会上，学校围绕“工程智能”系统布局的首批五大研究院宣告成立。

这五大研究院分别是：工程智能研究院、医学人工智能研究院、极端环境建造研究院、自主智能机器人研究院、航空运输与低空经济研究院。这是同济大学落实落细去年发布的《人工智能赋能学科创新发展行动计划（2024-2027）》的又一重要举措，是聚力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工程相关领域科技创新、产业发展的创新探索。

上海市副市长解冬，教育部科学技术与信息化司副司长舒华，东航集团董事长王志清，上海市政府副秘书长王平，交通运输部原副部长、中国公路学会理事长翁孟勇，上海交通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丁奎岭，同济大学党委书记、中国工程院院士郑庆华，同济大学原党委书记、校务委员会主任方守恩，上海市经信委主任张英，上海申康中心党委书记赵丹丹，上海市杨浦区区长周海鹰，上海人工智能实验室主任周伯文出席活动。

舒华致辞表示，同济大学一直以来都在积极探索人工智能领域的教育和科研创新工作，积极落实《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关于人工智能赋能教育变革与创新的战略部署，取得了显著的进展与成效。今天，同济大学以“工程智能”为战略支点，系统布局成立五大智能研究院，这是积极响应国家号召、顺应时代潮流的重要举措，展现了战略前瞻性和责任感。真切期望同济大学再接再厉、积极发挥带头作用，在“人工智能+”的新蓝海中开辟新路径，为全国人工智能赋能高等教育发展，以数字化支撑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丁奎岭致辞表示,人工智能对于筑牢强国根基、推动高质量发展具有战略性意义。此次同济大学开展人工智能赋能学科创新行动,是一次综合性、持续性、一体化的改革探索,彰显了高校在人工智能时代的作为与担当。上海交大与同济渊源深厚,当前两校在学科布局上,也有很多可以互鉴互补的地方。未来我们将和同济开展更加深入的合作,与更多兄弟院校携手同行,用人工智能作为发展的催化剂和推进剂,争做上海市乃至全国高等教育改革的排头兵和先行者。

解冬致辞表示,同济大学在上海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和综合改革方面起着重要的开拓引领作用,是人工智能上海高地建设的重要依靠力量。今天,学校聚焦“工程智能”战略,系统布局成立五大研究院,重点推动传统工程的产业向智能化模式转变,并且以此来示范带动教育链、人才链、创新链、产业链的融合发展,是学校践行“和祖国科教事业心手相牵、和上海城市发展相濡以沫”责任担当的生动写照,也是学校支持上海人工智能高地建设的具体行动。市政府将继续支持学校的建设发展,期待同济充分发挥五大研究院的作用,力争在技术的迭代革新、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等方面,形成更多范式的突破。

郑庆华作了题为《工程智能驱动学科转型发展》的主题报告,阐述了工程智能的同济方案。“同济工程学科群优势明显,人工智能学科快速崛起,科技成果转化能力强,希望围绕工程智能的这五大研究院建设,为国家打造教育科技人才产教融合新高地。”郑庆华说,希望这五大研究院实现“四大创新”。一是体制机制创新,打破院系制、学科化传统的人才培养和科研组织方式,建立“1+N”多学科交叉,以及科学研究资源、人才培养资源的共建共享共创机制。二是培养模式创新,通过揭榜挂帅、目标引领、问题驱动,深化产教融合,让学生在真刀真枪中锻炼成长。三是开拓新域新质,通过五大研究院的多学科交叉融合研究,提出前瞻性的科学研究方向,培育未来学科,突破“卡脖子”技术,创造新质生产力。四是评价体系创新,以成效、贡献、特色为准则,关注成果的原创性、实用性和经济社会价值。

“应强国建设之需,顺时代发展之势,同济大学将以五大研究院的创建为契机,推动学科转型,开拓新域新质,为服务和支撑中国式现代化,为助力上海三大先导产业发展和‘五个中心’建设,贡献同济智慧和力量。”郑庆华说。

舒华、王志清、王平、翁孟勇、郑庆华、方守恩、张英、赵丹丹、周海鹰、裘文进、赵震、屈炜、孙珊、戴敦伟,共同为同济大学工程智能研究院、医学人工智能研究院、极端环境建造研究院、自主智能机器人研究院、航空运输与低空经济研究院联合揭牌。

五大研究院院长分别介绍了各研究院建设方案。

工程智能研究院

人工智能与复杂工程的深度融合正在重塑工程领域的新质生产力。同济大学工程智能研究院以 AI4E (AI for Engineering) 为核心开展研究与创新, 聚焦工程智能基础模型与工程智能体的关键技术突破, 结合智能建造、智慧城市、智慧交通、智能汽车及智能制造等垂域开展前沿研究, 系统推进工程领域研究创新、产业实践和人才培养的智能化范式转型。研究院以“场景引领、机制创新、产教融合”为发展理念, 致力于打造工程智能领域教育-科技-人才-产业四链融合的示范基地, 为人工智能从基础研究到产业应用的全链条发展(0→1→N) 提供关键支撑, 服务国家和上海市重大战略产业转型升级需求。

医学人工智能研究院

作为人工智能领域最具变革性的前沿方向, 医学人工智能正深刻重构全球健康医疗的价值链条, 推动着医学研究从经验驱动向数据驱动跃迁, 并引领医学教育向智能化、个性化转型, 为全球医学事业提供众多可能的突破。同济大学医学人工智能研究院面向国家医学人工智能发展需求, 将重点开展科学智能与工程智能在医学领域的基础理论创新与关键技术攻关。研究院致力于系统性建设医学数据存储与计算中心、智慧医学教育中心两大支撑体系, 重点打造四大特色系统或者平台, 即通用医学大模型、医疗数据智能治理系统、医学人形机器人关键技术平台和智能药物发现与验证系统。通过构建“基础研究-技术研发-临床转化”的创新链条, 革新智能医学教育体系, 升级创新药物研发范式, 提升精准医疗服务能力。

极端环境建造研究院

当前, 科学研究向极宏观拓展、向极微观深入、向极端条件迈进、向极综合交叉发力。同济大学依托上海市未来学科成立极端环境建造研究院, 以高地、极地、地外等“三地”建造为牵引, 破解极温/风/压/加速度/磁等极端自然与信息环境下的选址规划、超材料原位利用、超结构设计、无人建造和特异灾害防控等核心科学难题。研究院整合土木、环境、测绘、力学、材料、机械、交通、建筑等多学科力量, 助力川藏铁路、南极科考站、月球基地等国家重大工程, 引领国际极端环境建造科学研究, 为支撑国家战略和推进产业升级提供坚实支撑。

自主智能机器人研究院

随着人工智能与机器人技术的深度融合, 自主智能机器人已成为全球科技竞争的战略制高点。同济大学依托上海市未来学科成立自主智能机器人研究院, 围绕“医疗康复机器人、智能制造机器人、极端建造机器人”等重点领域, 针对“机器人本体驱动、机器脑决策控制、机器人群体智能、机器人训练场”等科学难题和技术瓶颈展开深入研究。研究院面向国际前

沿，锚定国家重大战略，突破高性能关节模组、柔性电子传感、感知决策控制大模型和数据采集训练场等核心技术，助力上海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自主智能机器人创新高地。

航空运输与低空经济研究院

低空经济作为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已成为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引擎。同济大学积极响应国家低空经济发展战略，充分发挥航空、交通、测绘、管理、人工智能等多学科协同创新与融合发展优势，成立航空运输与低空经济研究院。研究院致力于塑造服务航空运输与低空经济发展的科技创新高地，构建低空物流、通航无人机等技术孵化的成果转化平台，成为行业交流的合作交往窗口，打造高端技术的人才孵化摇篮，为建设航空强国、培育低空经济新增长点持续贡献同济智慧与力量。

同济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院长介绍了“无界大模型”的核心技术和应用场景。“无界大模型”聚焦“空间智能一体化”核心愿景，贯通感知、认知与行动全链条，推动人工智能向认知决策、自主协同跃迁，迈向“理解世界、操控世界、协作世界”的新阶段。模型提出“数据驱动—知识引导—物理约束”三元协同机制，构建具身智能体的知行闭环与多智能体协同框架，突破当前大模型在空间理解、任务泛化与多体协作等方面的关键瓶颈。通过认知范式重构、智能控制架构设计与人机共智体系构建，提升模型在复杂动态环境中的空间理解与具身推理能力。未来，模型将在智能制造、智慧物流、城市治理等典型场景中发挥关键支撑作用，赋能人工智能的真实场景落地与系统化发展。

会上，同济大学工程智能研究院、医学人工智能研究院、自主智能机器人研究院、航空运输与低空经济研究院分别与相关企业签约，校企将共同推进创新研究与技术攻关、资源共享与成果转化、科创平台共建、人才培养与交流等多维度合作，携手共筑科创新高地。

当天，五大研究院还分别组织专题研讨会，一批知名专家学者为研究院建设发展建言献策。

（来源：同济大学微信公众号）

北京理工大学人工智能学院成立

5月17日，北京理工大学AI变革与科教创新论坛暨人工智能学院成立大会在中关村校区举行。多所高校、科研院所、相关企业代表参会。

北京理工大学校长姜澜介绍，北京理工大学对人工智能高度重视、提前布局，具备扎实基础。学校将通过“一零一一”（“10高-11力”）工程全力推进人工智能学院建设，即坚持

战略定位高举高打、学科建设高原高峰、发展路径高维高阶、产教融合高质高效、国际竞争高位高速的“10高”发展战略；构建“教师-学生-AI-环境-文化”的“五元”育人新模式，着重培养学生思想品德以及以创新创造力、工具使用力、知识获取力、问题分析力、逻辑思考力、自我驱动力、表达沟通力、规划制定力、行动执行力、组织领导力、评价选择力为核心的AI+能力矩阵。

姜澜表示，北京理工大学要打造人工智能拔尖人才培养新高地，构筑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突破策源地，创建智慧变革一体化示范区，为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贡献独具特色的北理工方案。

北京理工大学党委书记张军、校长姜澜和与会专家一同为人工智能学院揭牌。

据介绍，人工智能学院将打造“一核多能”AI创新复合体，构建起“XAI”交叉融合的自主创新生态，有力推动AI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体”融合发展，全面支撑学校全员AI教育和全校智慧变革。在2025年本科招生中，学校将在未来精工技术学院增设“卓越班”，本博贯通培养。此外，学校还将在徐特立学院增设“智能班”，通过学科交叉筑基、产教融合赋能、本硕博贯通，培养人工智能领域交叉创新复合型人才。

大会还发布了《智慧教育行动方案》。与会专家围绕人工智能学院建设、人工智能赋能科教创新进行主旨发言。

（来源：中国教育新闻网）

安徽师范大学等三方联合成立“AI+高等教育研究院”

5月21日，安徽师范大学、科大讯飞股份有限公司、安徽信息工程学院在安徽师范大学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围绕人工智能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AI+科研创新、未来人才培养、高校数字化转型等核心议题达成重要共识，并宣布联合成立“AI+高等教育研究院”。

根据合作协议，三方将以产业需求为导向，通过资源整合、场景共建和协同创新，将教育资源、技术平台与真实行业场景有机结合，构建“产学研用”一体化生态，促进“人才链、创新链、学科链、产业链”深度融合，构建教育服务产业、产业反哺教育的良性循环生态，完成人才培养、技术创新与产业升级的协同发展，真正实现产教融合。

具体合作将覆盖高等教育多个关键领域，围绕AI+人才培养、AI+科学研究、AI+教育教学、AI+智慧校园、AI+产业孵化等深入展开。在AI+人才培养领域，将共建AI专业、AI专业实验室和AI通识教育平台，探索产教融合的协同育人培养机制。在AI+科学研究领域，

将创新人机协同科研新模式，推进联合开发教育学、人工智能等领域学科大模型，并结合安徽师大“徽学”“文旅”等特色数据，共建垂直领域大模型，推动传统文化数字化与跨学科研究。在 AI+教育教学领域，将联合编写面向中国高校教师和学生的人工智能能力框架，共建 AI 融合课程群和未来教室实训空间，建设新一代智慧教室与未来学习中心应用场景。在 AI+智慧校园领域，将共建基础智算中心，围绕校园智能安全管理和智能化服务等内容开展共建。在 AI+产业孵化领域，将根据产业发展需求成立 AI 研究中心，共同开展研究并进行市场推广。此外，三方还将联合开展高水平成果建设、项目申报、平台建设等合作，形成战略合作长效机制。

此次三方合作的另一大亮点在于以资源互补打造产学研深度融合范式。安徽师范大学牵头教育理论与课程设计，提供教学资源与师范人才储备，重点在“AI+科学研究”“AI+教育教学”方面打造示范标杆，培养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高质量人才。安徽信息工程学院聚焦应用型定位，提供 AI 算力基础设施和智慧教育应用场景，建设智慧教育示范基地，探索可复制的产教融合路径。科大讯飞股份有限公司以技术和数据资源赋能全链条，推动 AI 教育产品标准化应用，为全国高校提供技术与案例参考。三方积极响应《中国教育现代化 2035》战略要求，推动教育数字化转型升级，整合“学术研究-技术支撑-场景实践”全链条资源，聚焦特色优势领域打造智慧教育创新标杆，贡献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安徽方案”。

“人工智能赋能高等教育前景广阔，校企合作空间巨大。希望通过三方协同，将先进技术与一线教学科研实践相结合，让研究院成为智慧高等教育的‘创新策源地’和‘技术输出地’，共同推进人工智能时代高等教育创新发展。”安徽师范大学党委副书记、常务副校长熊宇杰说。

（来源：安徽师范大学微信公众号）

高教研究

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与高等教育结构优化 | 胡娟 程鑫

作者简介：胡娟，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教授，教育部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发展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主要从事高等教育管理、教育发展战略研究；程鑫，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副馆长，副研究员，主要从事高等教育管理、图书馆学研究。

摘要：优化高等教育结构是促进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重要支撑。但是，我国在高等教育大众化过程中形成的陡峭的金字塔型的高等教育类型结构，集中度高、应用导向强、基础学科弱的高等教育学科结构和重心偏低、趋同度偏高的高等教育层次结构从不同方面对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形成了制约。当前在类型结构上应通过“存量调整”和“增量扩大”的方式加快扩大优质高等教育资源，在层次结构上应重点扩大研究生教育规模特别是提高研究生教育在应用型本科院校的比例，在学科结构上加强本科教育的基础学科建设特别是理科建设，逐步强化本科教育作为高等教育基础阶段的功能。通过统筹推进高等教育各类结构的调整优化，为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提供更好的系统环境。

关键词：拔尖创新人才；高等教育结构；人才培养；结构优化

（《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25年第4期）

文明的对话：对高等教育国际化的重审与前瞻 | 许美德 吴寒天 刘继安

作者简介：许美德（Ruth Hayhoe），教授，从事国际与比较高等教育、中国近现代教育变迁等研究；吴寒天，研究员、博导，浙江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中心副主任，从事国际与比较高等教育研究。

摘要：国际化可被视为现代大学自中世纪肇始即具有的内生属性。现代大学模式扩散至后发国家后与当地文化在冲突和互动中交融。大学不仅成为人类知识与文明交流互鉴的桥梁，其国际化进程也在后发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中扮演重要角色。出于对亨廷顿文明冲突论的反思，大学的独特性使其作为文明对话的平台从而避免文明冲突成为可能。儒家思想使中国大学在国际化进程中为促进国际和谐作出贡献。大学拥有知识生产和传播中心以及个体间思想交流枢纽的双重身份，它的文明职能无法被其他类型机构取代。大学促进文明对话最为直接和有效的形式是为来自不同文化的青年人营造有形或无形的交流空间。

关键词：高等教育国际化；文明对话；文化冲突论；中国大学；儒家文化；文明职能

在全球化浪潮与地缘政治博弈交织的当下，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意义已远超单纯的人员流动与创新扩散，而是关乎如何通过思想对话与知识论传统间的交融参与重构人类文明的秩序与格局。纵观历史，国际化可谓大学自中世纪肇始即具有的独特属性。对中国而言，高等教

育国际化进程与其作为现代国家的建构过程紧密相连,不仅推动了整体社会的知识与认知革新,而且深刻重塑了与世界对话、互动的方式。面对(逆)全球化趋势、国家间科技与人才竞争的加剧以及颠覆性技术所带来的伦理困境,世界各国的高等教育研究者与实践者或需超越文明冲突元叙事,转而从文明对话视角重构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应然使命。不同于将文明间差异视为冲突根源的悲观预设,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智慧为理解文明间关系提供了更具包容性和确定性的框架。大学作为具备跨文化知识共同体属性和应对全球性议题创新能力的组织,恰能成为践行文明对话理念的特殊平台。

一、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历史演进与现实危机

(一) 作为高等教育内生历史属性的国际化

学界普遍认为,现代意义上的大学(Universitas)源于欧洲中世纪大学。欧洲中世纪大学创设的学院制度、学科制度、课程教学制度、考试制度、学位制度等沿袭至今,仍作为大学组织的核心要素存在。国际化是现代大学自肇始即具有的内生属性。11世纪,保存在阿拉伯世界的古典时代的典籍被重新发现并运回欧洲;亚里士多德(Aristotle)、欧几里得(Euclid)、托勒密(Claudius Ptolemaeus)等在欧洲“失传”的“新”知识连同来自阿拉伯世界的科学与文化,吸引着欧洲和地中海沿岸各地“乐于学和乐于教的青年,聚集在巴黎和博洛尼亚”。“大学起源于大批求学于名教授的学生”,它们把“知识生活”制度化为具体的组织形式——来自不同地区、种族和文化传统的成员汇聚于此,使用同一种学术语言,即拉丁语进行交流。这一延续千年的独特组织诞生于思想、知识与文化的交流与融汇,其间所教授和探讨的知识源自东西方文明共同的智慧结晶。

相较于欧洲中世纪大学,古代中国的书院提供了高等教育机构(或精研高深学问的机构)中知识交流互鉴的另一种模式。书院最初出现在唐代(公元618—907年),彼时科举制正趋于制度化,然而书院却在许多方面与依附于科举制的官学迥然相异。书院通常由本地士绅或佛教寺庙资助,因享有对土地的所有权和地租收入的支配权使之在财务上保持独立,其藏书和学术研究活动吸引了当时各年龄段的学生。书院中的活动包括讲座、相互切磋文章,以及在清雅幽静的环境中自学等——每个学生都与书院的管理者和学术领袖即“山长”建立密切的关系。及至宋代(公元960—1279年),书院对知识的讲授越来越符合儒家官方流派(即理学)的要求,然而由于书院对佛家、道家等其他思想流派的引入,这种明显的一致性反而引发了对儒家正统观念的不断质疑和重新思考。书院的开放性使之有别于依附科举制、教授

规范知识的官学。当我们将古代中国的书院与欧洲中世纪大学作对比时,就会发现其拥有更为广泛的知识自由,即并不局限于脱离实践的理论探究——这与源自中世纪大学传统的“学术自由”概念形成鲜明对比。

现代大学这一组织模式随着西方国家的殖民扩张与后发国家的自主借鉴逐渐扩散至全球,并与当地文化与知识论传统在彼此冲突、互动中交融。随着民族国家(Nation State)的建立,大学逐渐从与社会保持距离的“象牙塔”成为国家教育制度的一部分,承担着国家本位的使命。作为生产和传播高深知识的主要机构,大学在人类知识与文明的交流互鉴中起着重要的桥梁和枢纽作用。以大学为主要载体的高等教育国际化进程也在后发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

(二) 高等教育国际化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影响

高等教育国际化历史最为悠久的历史即为留学。中国在明朝末年曾出现资本主义萌芽,但朝代更迭和清朝闭关锁国政策阻碍了其走向现代社会的步伐。两次鸦片战争后,一批有识之士大声疾呼向西方学习。彼时的清政府听取了接受过西方高等教育的改良派容闳的建议,于1872年派出首批“留美幼童”,其后又相继派遣留学生赴英、法、德等国学习造船、交通、兵技等。甲午战争失败后,中国大批留学生旋即赴日本探寻救国良方。1918—1920年,蔡元培、吴玉章等发起的勤工俭学会、法华教育会,先后促成1600余人赴法留学,涌现出周恩来、邓小平等一批革命领导者。1911年,美国利用“庚子赔款”设立清华留美预备学校(清华大学前身),留美渐成主流。部分“庚款学生”回国后试图以美国教育为蓝本改革中国教育,其中包括梅贻琦、竺可桢等著名的大学校长。1949年以后,钱学森、华罗庚等在海外已颇有建树的留学生陆续回国,着手建立中国的学科体系。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大幅扩大公派留学规模,同时自费留学生也渐成留学大潮的主体。1978—2024年,中国大陆地区赴海外留学人员累计超过800万人。归国留学生在中国社会转型和发展中发挥了全方位、深层次、根本性的作用。自清末以来的百余年间,大批留学生将西方科学技术和社会思潮带入中国,推动了中国经济、社会、科技、文化事业的发展,深刻影响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促进了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在经济、政治和文化等领域的交流与互动。

纵观各后发国家历史,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另一重要形式即为创办现代大学,系统借鉴西方知识体系和办学制度培养本土人才。中国现代大学的发展史就是将西方大学模式本土化的过程。1901年,传教士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利用英国“庚子赔款”创办山西大学—

一辛亥革命前中国仅有的三所大学之一。成立于1898年的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起初追随东京大学模式，而后者本身即深受法国、德国等欧洲大陆国家大学模式的影响。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则致力于将德国“洪堡模式”（Humboldtian Model）本土化。随着1929年清华大学划归教育部，美国模式对中国高等教育的影响日盛。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仿照苏联模式进行了大规模院系调整，建立起了适应计划经济体制的高等教育体系，服务国家快速工业化需要。改革开放以来，新的学习西方，尤其是对美国高等教育模式再次学习的浪潮兴起。显而易见，中国现代大学体系的形成和发展既可被视为高等教育国际化进程，亦可被视为文明间交流与互鉴的载体与成果（诚然其早期历史具有殖民与被殖民的色彩）。今日的中国大学已经逐渐发展成熟，且在保持本土传统和与世界大学制度接轨方面找到了新的平衡点，其全球学术影响力日益彰显。鉴于其历史传统与现实地位，中国大学显然有能力通过国际化进程促进人类文明对话与交流，继而重构全球化新图景。

（三）高等教育国际化在当今世界面临的挑战

进入21世纪以来，全球化趋势发生重大变化：国家主义、民粹主义在全球抬头，逆全球化与全球化两股潮流相互激荡，国际格局加速演变。政治、经济与科技力量的此消彼长导致国际格局局部重组，世界政治进一步朝向多极化发展。俄乌冲突、巴以冲突等地区冲突延宕升级，地区和国际秩序加速转型。国与国之间的军事竞争、经济竞争已前置到科技和人才领域的竞争。在当前国际秩序的转型期，中国与西方国家间的科研合作、学生和人才流动等频频受阻，高等教育国际化进程面临挑战。危机通常伴随着机遇，借助高等教育国际化开展文化外交和跨文化互动在当前情势下显得愈发重要。中国这样具有悠久文明史的国家，尤需重视以高等教育为载体将“和而不同”“天人合一”等中国人理解不同文明间关系、人与自然间关系的传统价值观带入世界思想体系。此外，“一带一路”倡议虽让世界看到中国对全球南方国家的积极贡献，但西方社会仍担忧中国试图通过基础设施项目重塑地缘政治格局。因此，充分发挥高等教育国际化在加强文化沟通与增进文明理解方面的作用，或将有助于消减西方社会对中国的误解。中国大学发展至今，已经能够在服务国家的同时成为世界舞台的积极参与者，主动思考和践行其全球责任。在当下充满挑战的世界中，中国大学不仅有能力在事关全球公共福祉（Common Good）的诸多领域作出贡献，而且可以在促进不同文明对话、致力于冲突解决的过程中贡献有别于西方世界固有元叙事的中国智慧。

作为多伦多大学的一员，笔者在为杰弗里·辛顿（Geoffrey Hinton）教授先后荣膺图灵奖和诺贝尔物理学奖而深感自豪的同时，也不免对日渐强大的人工智能之于人类文明深刻的

影响加以深思。毫无疑问，辛顿等这个时代的杰出学者在人工智能领域作出了开创性贡献，为科技、生活以及社会的方方面面带来了显著变化。然而与此同时，包括他本人在内的学术界、思想界也表达出深层次的忧虑，即日渐强大的机器是否会以不符合人类整体利益的方式脱离人类的控制。因此，全球各国各地区的大学应当考虑如何应对这一潜在危机，高度关注科技伦理，以人本主义作为基本的价值指向，使技术的进步造福人类而非摧毁人类文明。

二、走出亨廷顿的元叙事：从“文明冲突”到“文明对话”

（一）亨廷顿所建构的文明冲突元叙事及其影响

自冷战结束以来，伴随着原有的两极格局瓦解，使用意识形态这一单一因素解释和预测国际局势乃至人类文明的走向日渐捉襟见肘。因此，学界提出诸多理论、学说对日趋多极化的世界格局加以诠释，其中尤以美国当代著名政治学家萨缪尔·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所提出的文明冲突论(Clash of Civilizations)影响最为深远。亨廷顿将当今世界的主要文明归纳为西方文明、儒家文明、日本文明、伊斯兰文明、印度文明、斯拉夫东正教文明、拉丁美洲文明以及非洲文明，并认为未来新世界中主要冲突的根本原因将不再是意识形态或经济因素，文化差异将成为人类社会重大分歧与冲突的根源。亨廷顿认为，尽管民族国家仍将是世界事务中最强大的行为主体，但全球政治领域的主要冲突将发生在具有不同文明的国家和国家群体之间——文明间的冲突将是当今世界冲突演变的最新阶段。他继而预测，未来最重大的冲突将发生在不同文明间的断层线上，而造成冲突的原因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几个方面：不同文明间固有的“基本”(Basic)差异；不同文明人群的互动日益频繁；经济现代化与社会变革进程使人们弱化过去长期存在的地区特性；西方社会中文明意识(Civilization-consciousness)的不断增强；文化特征及其差异相较于政治和经济问题的不易调和性；地区主义(Regionalism)在全球各地的日益兴起。

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在一定程度上回应了冷战结束后意识形态因素主导国际格局这一论断的式微，从文明视角对多极化格局的形成作出了解释。然而，作为一名兼具自由主义思想与保守主义身份的政治思想家，其文明冲突元叙事对人类社会走向的预判过于悲观，对不同文明间差异的不可调和性估计过高，对整体人类文明固有共性及其发展估计不足。进入21世纪以来，不少中国学者深入思考后冷战时代、多极化进程中的全球格局及其变化规律。例如赵汀阳认为，基于民族国家体系所定义的国际政治概念正在与现实失去对应性。他随即引入古代中国的“天下”概念，借用这一源自先秦时期用以描述“华夷秩序”的概念诠释当今

动态的世界化 (Worldlization) 过程, 即视整个世界为政治单位的共在秩序 (Order of Coexistence), 将世界作为分析问题的整体单位或主体。赵汀阳认为, 这一视角沿袭了管子“以天下为天下”和老子“以天下观天下”的方法论, 并且在 3 000 年前的古代中国有过局部实践。简而言之, 这一方法论通过强调所有外部性的内部性转化可能, 在逻辑上排除了作为绝对异己的异教徒 (Pagan) 概念, 因此与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的基本思维模式截然不同。赵汀阳等中国学者的思考实则提供了一种可能性, 即从长期统治学术话语的西方世界之外找寻建构另一种元叙事的思想 and 文化的土壤。

(二) 对文明冲突论元叙事的反思

出于对亨廷顿文明冲突论元叙事的反思, 笔者在 1995 年即讨论了大学 (或精研高深学问的机构) 在促进不同文明间理解方面可以发挥何种作用。事实上, 无论是现实主义还是自由主义关于社会变革的观点, 从根本上说都是基于欧洲的经验, 即启蒙运动和理性主义的兴起, 以及西方世界成为全球霸主的过程, 而大学作为一种西方世界的机构 (Western Institution) 则深刻地卷入到这一西方历史经验之中。与 18 世纪、19 世纪为适应迅速工业化的社会 (Rapidly Industrializing Societies) 发展需要而出现在欧洲的现代国家学校教育体系不同, 大学的历史可以追溯到 12 世纪, 其模式受到行会、商业城市、修道院以及教堂四类中世纪机构的影响。由于其历史渊源, 自治和学术自由成为大学不可分割的核心价值——即使是在由政府主导的教育体系中——这意味着大学可以与不同文明建立底层联结。因此, 大学的独特性使其作为不同文明对话的平台, 从而避免亨廷顿所预言的文明冲突成为可能。

就中国的高等教育机构而言, 其深厚的儒家传统使之在国际化进程中或能为促进国际理解与国际社会的和谐作出更显著的贡献。孔子在各诸侯国中广泛游历, 传达仁爱与正义的主张。孔子并未选择深入研习当时更为流行的兵法或纵横术, 而是转而关注他所认为的人类繁衍生息所必不可少的两种品质, 即“信”与“仁”。“信”意味着口出之言的真实性, 而“仁”则表明存在一种人人需共同遵守的道德准则。孔子所传达的种种“善”的理念也被解释为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 这显然可被视为跨文化或跨文明对话的理想原则。此外, 不同于亨廷顿对不同文化、文明间相互关系的基本预设, 在提出“爱”“信”“仁”等核心价值的基础上, 孔子又提出了“和而不同”和“和为贵”的思想。“和”可被视作儒家思想的最高境界, 这一价值观在漫长的历史中塑造了中华文明对待不同文明的态度。尽管道教 (道家) 和佛教也深刻影响了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 但毫无疑问, 儒家思想在广度和深度上都是古代中国最重要的精神遗产。如果中国的高等教育机构能持续从儒家思想中汲取丰富的营养, 其高等

教育国际化进程非但不会带来新的冲突,反而会在促进不同文明对话上发挥较之于西方大学更大的作用。

三、作为文明对话重要载体的大学：对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前瞻

(一) 大学在文明对话中的作用与地位

为什么只有大学能成为超越政治、文化、社会因素的文明对话重要载体?除上文所提及的其历史根源所赋予的国际化内生属性外,大学在历史及当下的具体功能与社会角色亦是重要原因:大学是高深知识生产与传播的主要机构,也是最具思维活力和自由精神的青年人的汇聚之地。作为致力于科研与创新的专门机构,大学的角色超越了国家与文化的边界,在尊重不同观点与立场的前提下创造应对全球共同挑战的通用知识。具有全球声望的研究型大学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青年才俊,并由此汇集了丰富多彩的思想与文化,实现了学术共同体内部知识的多样性以及知识生产模式的多元化。思想与理念的交汇催生了批判性思维、开放式对话以及对共同价值观的探索,使知识生产共同体的成员(学生、学者等)能够实现实质性的跨文化知识交流与知识生产协作。通过促进不同世界观的交汇,大学不仅推动了科学与技术进步,而且培养了相互理解、协作的个体知识生产者,使其成为沟通不同文明、促进全球和谐不可或缺的力量。大学的上述双重身份,即先进知识的生产和传播中心以及富有智慧和自由精神的个体间思想交流的枢纽,共同造就了其在文明对话中的独特作用和角色,这也使其特有的“文明职能”(Civilization-related Functions)无法被研发机构、科技公司、独立实验室等其他类型的高深知识生产与传播机构所取代。此外,大学相较于上述机构天然具有多学科性和包容性特性,因而不仅能促进特定自然科学或技术领域的进步,而且能实现人文、社会科学、艺术等领域与科学技术的对话,这对在不同文化背景下理解和诠释人类共同挑战具有重要意义。

(二) 文明对话：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未来形态

在20世纪新马克思主义(Neo-Marxism)和结构功能主义(Structural Functionalism)两大社会学思潮的基本叙事中,世俗化(Secularization)已被认定为高等教育发展的必然方向。自提出文明冲突论以来,亨廷顿即呼吁西方世界的大学更加开放地了解其他文明的哲学与宗教价值观,这促使联合国将2001年定为“不同文明间对话年”。在充满变化与不确定性的时代,作为文明对话重要载体的大学不应仅是技术革新的策源地,而应当通过思想的产出推动人类文明的可持续发展,为持续增进全人类共同福祉作出贡献。大学促进文明对话最直接也

是最有效的形式是为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青年人营造有形或无形的交流空间。具体而言,大学需通过推动变革性思想和颠覆性知识的产生来应对气候变化、社会不平等以及公共卫生危机等全球性挑战,或是通过整合不同的观点就上述议题提出创新性、包容性、整体性的解决方案。为此,大学需积极创建、维持和发展实体及虚拟的平台,供具有不同文化和知识背景的青年人就共同的目标开展对话与合作,加深对彼此世界观的理解。无论是真实校园国际化氛围与承载力的提升,还是全球科研网络、在线学习平台等的搭建,其目的都在于使身处其中的学生和学者超越文化与地理隔阂,培养相互尊重、信赖、理解的全球公民意识。因此,高等教育国际化在未来的具体形态应是通过搭建上述具有跨学科性、文化包容性和协作性的科研与学习空间,在文明互动中推动全人类共同议题的解决,并在此过程中培养具备解决人类最紧迫问题所需的知识、能力与同理心的未来领导者,共同致力于加强全球各文明间的交流,最终惠及整体人类社会。

就中国大学而言,其在促进不同文明对话、推动人类文明可持续发展方面具有独特优势。第一,中国的近现代发展历程及其深厚的儒家文化传统使之成为连接东西方知识与思想的独特桥梁,为不同文明环境下的哲学与科学成就间的相互对话与交融提供了可能。厚重的历史积淀使中国大学能将儒家所倡导的关注集体福祉、尊重不同文化等原则融入全球化、智能化时代的高等教育实践。例如中国大学在未来或可将古代书院所内蕴的育人智慧融入各类跨文化数字平台的构建过程,创造古今交融的虚拟空间育人范式,从而将非西方的古老智慧与知识传统内化为未来全球公民的核心素养。第二,中国高等教育体系庞大的规模和丰富的多样性使其能够承载广泛、多元的国际交流。“双一流”建设等顶层设计提升了众多中国研究型高校的全球地位,吸引了大量优秀的国际学生、学者以及经过海外深造的中国留学生。日益提升的国际化程度促进了中国大学内部的跨文化交流,使其有能力将自身营造为充满活力的文明对话场域。此外,中国大学在“一带一路”倡议中发挥着重要的引领作用,与全球各地区尤其是全球南方的众多高校开展合作,初步形成了横跨各大洲、各文明的科研合作与知识共享网络,扩大了中国大学在塑造全球学术版图和文化话语方面的影响力。第三,中国大学在利用技术手段创造跨文化互动虚拟空间方面走在世界前列,这不仅扩大了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受众,更促进了跨越地理障碍的对话。在数字化、智能化时代,运用新兴数字技术营造虚拟平台或空间已成为全球连接的新形式。高等教育国际化模式的虚拟化迭代为包括中国大学在内的新兴经济体、非西方高等教育机构服务文明对话提供了新的契机——这一模式革新的意义或不亚于19世纪中后叶学生、学者大规模跨境流动的出现。在此过程中,大学尤需

关注乃至警惕的是技术对价值立场的裹挟。虽然人工智能技术为处理海量的科学和技术数据提供了极其有效的工具，并且能显著促进其快速传播和应用，但它无法对区域或全球层面更广泛的公众或共同利益作出承诺。因此，大学在精神和价值层面对技术的干预显得尤为重要——这从侧面证明了大学中人文领域研究的重要性。第四，得益于政府对教育和科研的持续投入，中国大学有能力为国际科研合作项目以及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学生、学者提供资助。这进一步促使中国大学成为国际化、全球化包容性参与的催化剂，充分展现高等教育(国际化)推动全人类团结与进步的重要力量。

(《高校教育管理》2025年第3期)

教育强国建设背景下高校教学的数字化转型:形态、困境与进路 | 洪志忠 罗霞

摘要: 数字化转型是实现教育强国战略的重要举措，为高校教学改革提供了新动能。数字技术赋能高校教学新形态，推动精准化、场景化、协同化和混合式教学发展。然而，数字化转型也带来了高校教学的数字困境、主体困境、资源困境和价值困境。在推进高校数字化教学时，应基于教育需求，构建适应性的数字教育生态；重塑师生主体地位，提升数字素养与技能；确保质量与公平，加强数字教育资源共享和基础设施建设；平衡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构建透明且个性化的教学数字化体系。

关键词: 教育强国；高校教学；数字化；教学新形态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3期)

高等教育数智化的价值向度、主要特点及实现路径 | 张继平 徐心如

作者简介: 张继平，男，苗族，云南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博士生导师。徐心如，女，云南师范大学教育学部硕士研究生。

摘要: 高等教育数智化转型是新时代教育领域发生的深刻变革，是建设教育强国的应有之义，是构筑科技强国的重要基石，是构建人才强国的关键要点。高等教育数智化是一个内涵丰富的概念，具有教育思想人文化、教学资源泛在化、课堂教学智能化和个人学习终身化的特点。实现高等教育数智化，需要坚持人本化、开放化、智慧化和终身化的价值导向，着

力教育教学资源及人才培养模式改革。

关键词：高等教育；数智化；高质量发展；数字中国

以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蓬勃发展，推动人类社会迈向万物智联、开放包容、协同共生的数智化新时代，也开启了高等教育向数智化转型的纪元。诚如卡尔·雅思贝尔斯所指出的，“当社会发生革命之际，也就是教育转型之时”[1]。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推进教育数字化、建设全民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学习型大国”[2]。2023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提出，“促进数字公共服务普惠化，大力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完善国家智慧教育平台”[3]，推动形成教育事业的数智化新形态。相较于基础教育而言，高等教育系统中的人因其独特的科技应用能力而会使该系统更先迎来数智化的转型升级与赋能发展。可以说，数智化转型既与高等教育的高质量发展具有高度的耦合性[4]，也是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源泉。

一、高等教育数智化的价值向度

高等教育数智化转型是新时代教育领域发生的深刻变革，是保障高等教育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条件，也是推动科教兴国、人才强国重大战略实现的强大动力。新时代背景下数智化转型赋能高等教育既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促进社会全面发展的现实要求。

“数智化”一词最早是由北京大学“知本财团”课题组在2015年正式提出的，该课题组将其定义为“数字智慧化和智慧数字化的集合”。刘国斌和祁伯洋从经济学视角指出，“数智化是数字化和智能化的合称，通过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5G、区块链等现代信息技术，培育数字经济、智慧经济、信息经济等新的增长点，满足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信息数据智能化处理、分析和管理需要，实现经济社会数字化、智能化发展的一种发展模式或过程”[5]21-22。王秉则将“数智化”解读为“依托和利用数智技术来培育和发展数据这一新的生产力并使之造福于社会的历史过程，它是一个漫长的持续推进过程，数智化进程可用社会的数智化程度来衡量”[6]。综合来看，“数智化”即利用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等现代信息技术，通过算法对海量数据进行深度而精准的挖掘和分析，实现数字的智能化和智慧化，并使之服务于社会全面发展的持续性过程。所谓“高等教育数智化”，就是将5G、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智能化和智慧化的数字技术运用于高等教育系统，实现教学、科研等活动的信息化、数字化和智能化，推动教育思想、教学资源、人才培养方式和个人学习形式等持续变革发展过程。高等教育数智化转型是一次重要的时代机遇，对教育、科技及人才事业的发展影响深

远。

（一）高等教育数智化是教育强国的应有之义

建设教育强国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工程,是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先导。教育强国的建成,不仅强调高等教育质量全面提升和综合实力显著增强,更强调高等教育要为国家强盛提供充足的人才和智力支撑以及道德和价值引领[7]。数字文明新时代,智能化和智慧化的科学技术对提升高等教育质量和实力,培养高品质人才具有重大的赋能价值。在这种意义上,高等教育数智化是建设教育强国的题中应有之义。

《无限的可能:世界高等教育数字化发展报告》首创性地将全球高等教育数字化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即转化、转型、智慧[8]。首先是转化阶段,即促进数字技术与高等教育体系融合发展。在此阶段,高等学校基础设施已在逐步完善,各项软件和硬件也在不断磨合,教学活动突破时空限制,教学内容、方法、评价等核心要素在物理和网络空间的交融中得以重新组合[9]6。由此,高等教育在数字技术加持下孵化出新发展模式,各类设施条件优化提升,传统模式开始转变,进而为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教育强国的先决性建构打下坚实基础。其次是转型阶段,即高等教育实现自我转型与升级,高校内部业务流程实现重塑。在此阶段,高等学校通过对数据进行深度分析,挖掘其内在价值,实现教学全要素、各环节、全面化的数字化转型,并通过数字信息技术合理应用,实现内部治理现代化,为学生提供个性化、多样化、全过程、智能化教学服务,满足学习者多元化学习需求。这种转型,使高校内部治理体系获以再造,以此实现高校治理能力现代化,并为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教育强国的战略性实践增添强大的内部动力。最后是智慧阶段,即高等教育将会完成重塑,并进一步打破与社会之间的界限。在此阶段,高等教育在新一代信息技术的深度应用之下,坚持以人为本,虚实联通,兼顾教育的优质化和公平化,并根据学习者的多元需求构建智慧学习空间,全面赋能学习者的发展,形成高等教育全新生态[9]6。不难看出,高等教育数智化转型的内在价值是坚持以生为本,着眼于培养高质量高素质的数智型拔尖创新人才,以适应智能化时代浪潮和实际需求,为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及教育强国目标的实现储备不竭的活水泉流。

（二）高等教育数智化是科技强国的基石

科技强国是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的重大战略,具体包含内外两个核心:对外强调在国际世界的科技博弈中赢得话语权,对内则注重通过科技创新达到国家的长治久安[10]。加快建设科技强国,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既能让中国在世界新一轮科技竞争和产业革命中获

得主动权和话语权,又有助于解决国内长期面临的“卡脖子”关键技术难题。毋庸置疑,数智化既是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引擎,又是建设科技强国的重要推手。一方面,数智化可以将具有高度组织性、创新性的国内外前沿科学技术引入高校课堂,加快传统课堂与新兴技术的融合革新,开创具有数智时代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教学范式,同时加速高校课堂内容、教学方式、课程评价、学校管理与服务等方面的全方位、全场域、全过程革新,让高校学生在数字科技的教学环境中进行沉浸式的个性化学习,从而提升学生的数字体验、分析和运用能力,增强学生的数字素养,实现拔尖创新人才的自主培养,助力高校进一步建设成为世界高水平人才培养高地。另一方面,高校作为教育、科技、人才的核心交点,具有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的重要职能,在高新科技的赋能和优化下,教育和人才事业得到反哺,从而使得教育、科技和人才之间形成统一、循环的良性发展格局,更好为科技强国的构建熔铸强大合力。加快推进科技强国战略,高等教育数智化应积极推进政产学研协同合作,通过政府调控、科教融汇、产教融合等方式打通政府资金链、社会产业链、高校人才链和研究创新链四链之间的快车道,进而疏通消除国内“卡脖子”核心技术的难点、痛点和堵点,并增强中国在国际市场的综合竞争力,提升世界科技地位,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世界高端技术龙头创新。

(三) 高等教育数智化是人才强国的关键要点

人才强国即大力开发人才资源,实现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推动国家人才竞争力和综合国力极大提升[11]。数智化赋能高等教育,有助于创新高校人才培养模式,增强新一代人才的数字技能,为推动实现人才强国战略强基固本。2023年3月13日,在十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回答记者提出关于人口负增长问题时指出,“‘人口红利’没有消失,‘人才红利’正在形成”。高等教育快速高质量发展具有提高人才质量、改善人口结构的功能,可以将潜在的人口红利变为现实的人才红利。高等教育系统中的人,可以通过数字化学习,进一步提升和转化自身能力,提高综合素质和技能水平,形成人才资源充分涌流的局面。从这个意义上讲,高等教育数智化转型是建设人才强国的推进器。一方面,高校师生作为高深学问的探索者,对信息技术变革和创新具有高度的敏感性和捕捉力,当新一代数字技术在渗透教学管理全域后,高校师生会自觉或不自觉地提升自身数字素养和数字应用技能,以便更好利用新兴技术服务教学、科研或管理,或运用数字科技进行个性化、智慧性的自适应学习,以此实现各主体能力的数智化转型,更好适应教育教学范式的变革趋势。另一方面,社会各方学习者可以借助依托高校数字创新开设的云平台,如2022年中国上线的面

向全民服务的国家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开展更加多样的学习,这样有利于推动高校内部知识“走出象牙塔”,增强并提高社会成员对高等教育知识的认同感和使用度,更好地造福社会进步,惠及全民素养的整体提升。

二、高等教育数智化的主要特点

高等教育数智化既是一个内涵丰富的概念,又是一个与时俱进的命题。数字文明新时代,高等教育在推动数智化转型过程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同时也呈现出更加鲜明的时代特点。

(一) 教育思想人文化

伴随着深度思维、人工智能等数智技术在高等教育领域的广泛深入应用,以学生为中心的人文教育转型成为主旋律,教育逐步回归“人本价值”,学生的个性化需求得到重视,教育供给实现了从“限定性”到“定制化”的转变[12]20。韩启德曾有个生动的比喻:“科学技术像一辆快速行驶的列车,人文学应该是刹车系统。要想刹车,人文学必须在车上。”[13]数智化赋能高等教育,必须重视人的文化向度,这样才能充分发挥科技的教育价值,更好践行“有教无类”“因材施教”和“教学相长”等传统优秀的人文教育理念。首先,高等教育数智化重视人本化的学习变革,主张依托智能化的现代信息技术,开设学习云平台,例如国家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智能图书馆等,面向所有学习者开放,因而不论是学习天才、普通学子,还是身有残缺的学习者,都能够从这类平台找寻适切个人的丰富资源,获得高等教育需求的满足感,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高等教育的学习门槛,扩大高等教育的辐射范围和受众群体,在学习者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上实现公平,从而达到尊重每个个体存在和价值的平等,推动“有教无类”成为现实。其次,高等教育数智化强调学生的个性化教育和学习,注重学生的身心健康和自由发展,借助于智能化、智慧化的数字技术,形成对学生学情的精准画像和知识图谱,进而使教师可以依据数据分析的确切结果,针对性地对学生的学习情况进行评价、指导和建议,更有效地促进学生的个性化、差异化发展,以此实现高等教育教学的“因材施教”原则。最后,数智教育对高校师生的基本素养和能力都提出相应要求,学生需要利用先进技术完善自身学习,教师需依托数字技术完成自身的教学或管理工作。然而对于一些数字素养不足、年纪较大的教师而言,学习并运用新兴科技完成教学工作存在较大难度,因而这类教师可以通过学生或者其他年轻教师的帮助,实现自身教学技能的数字化转型,故而达到各相关主体数字素养和能力的共同提高,终而促发师与生、师与师之间的“教学相长”,

推动师生教学的价值共存。可以肯定地说,高等教育数智化转型有助于继承并发展千年以来的教育思想精华,促进传统与创新的有机结合,凸显人文教育的本真追求。

(二) 教学资源泛在化

大数据、物联网、区块链等新一代信息科技推动形成了万物共联、资源互通的发展格局,高等教育与现代科技的融合进一步实现了高等教育教学资源的易得性和泛在化。无处不在的终端通过物联网与互联网的结合,将感知到的信息实时准确地传输到数据中心,汇聚成海量数据,然后利用云计算、数据挖掘等数智技术,在对数据进行分析与处理的基础上涌现智能,并通过微服务形态泛在化地嵌入社会空间。将广泛分布的终端应用于高等教育系统中的教学,有助于汇集全国各大高校、各个领域和行业的优质教学资源,形成海量的数据智慧库,同时终端作为智慧资源泛在化的触点,起到了连接人与人、人与物、物与物之间信息交流的作用,从而惠及服务全国高校师生[14]。一方面,当学生在互联网终端发布相应指令,便可根据学习需求随时随地寻找优秀的授课教师和合适的学习资料,这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学习资源获取的界限和壁垒。另一方面,高校教师也能够通过终端获取其他高校教师的教学视频和资源,并借鉴优秀教师的教学思想和教学内容,从而改进完善自身教学,提升教学质量和教学水平。另外,身居高等教育系统之外的社会成员也能够借助互联网端口,在海量资源中搜寻有用资料,满足自身的学习需求,提升自身的知识水平和能力素质,形成全民学习、终身学习氛围。一言以蔽之,高等教育数智化转型有利于实现“一个终端在手,天下良师优资我都有”的学习愿景,这也是高等教育教学资源的泛在化优势所在。

(三) 课堂教学智能化

数字技术与高等教育的深度融合,实现了课堂教学物理空间和虚拟时空的联结交汇,虚实切换无阻碍[12]20,可以提升高校课堂教学的智能化水平。一是通过虚拟现实、增强现实、扩展现实、混合现实、脑机接口等,形成虚拟的课堂环境,使得教学内容以仿真性、情景化的方式呈现,实现高校教学方式的数字化升级,进而增强高等教育教学活动的新鲜感和吸引力,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推动学生学习由外部动机化为内部动机,同时还可以减缓教师的授课倦怠感,提升职业认同感和满足感。二是虚拟实验室、仿真课堂和智慧学习空间的创设,能够为教学实验或课堂实践需求较高的理工农医林等专业提供专业模拟的虚拟仿真情景和实验室,便于师生开展沉浸式的具象化实践活动[15]。这种身临其境、虚实结合的情景体验式课堂可以最大程度地让师生进行实验观察、创新活动或问题解决,从而达到生动有趣、高

效立体的数字化教学效果,这不仅可以丰盈师生的想象世界,引发知识和情感认同,还能够大大提升高等教育的教学质量,反推高等教育教学改革创新;同时,学生在虚拟仿真的环境中进行学习和实验,可以更好提升理论学习效果 and 实践能力,帮助学生丰富并增强其动手践行的经验和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学生在现实工作中实习的时间和金钱成本,加快弥补行业职位空缺,满足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现实需求。三是将虚拟技术引入高校课堂,改变了传统的教室空间格局——以讲台为焦点,以教师为中心,桌椅陈列整齐划一的局面[16],借助于数字信息传播媒介,可以大大改善师生间知识传输的单向线性模式,增强学生的课堂参与感和体验感,鼓励学生的情感回馈,进而在师与生之间形成虚拟环境包围下的信息双向传导闭环。简而言之,高等教育数智化转型有助于打造虚拟仿真的课堂环境,实现沉浸式的高科技感教学,体现高校课堂教学的智能化特色。

(四) 个人学习终身化

随着5G、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兴科技在高等教育领域进行全过程、全环节的渗透,学习者学习的时间界限逐渐模糊,“想什么时候学就什么时候学,想学哪个阶段的知识就学哪个阶段的知识”成为现实,学习者的学习时期不再狭隘地局限于高等教育的适龄阶段。这就意味着,传统学龄阶段的“学生”概念将会被终身学习的“学习者”概念所取代[17]。从传统高等教育理念来看,当一个学生毕业走出大学校门,放下为追求高深学问而读的书本,便不再是学习者,转而成为社会人。科技发达时代,随着知识迭代更新速度加快,以及经济的发展和人们观念的改变,终身学习一词进入大众视野。党的十六大首次将“建成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党的十七大至二十大报告中进一步阐述了终身学习的意义与内容,旨在引领全体人民形成终身学习的自觉。高等教育作为学习者个人继续学习与不再学习的人生交汇点,理应响应国家号召,积极承担改革创新的社会使命,帮助学习者形成终身学习的动机与愿景。数智化赋能高等教育,为学习者提供了丰富全面的数字资源库和便捷高效的学习资源获取途径,也给学习者造就了随时可供学习的完备条件,只要学习者具备基本的联网设备或是稳定的网络环境,便可按照个人的需求和空便安排学习计划,即使在职工作仍可完成高等教育学习内容。同时,在新一代数字技术的支持下,高校能够建立起全开放、无限制、永更新的智慧学习系统,为每一位学习者提供持续性、不受限、不间断的学习服务,让“活到老、学到老”成为现实。毫不夸张地说,数智化技术打破了大学与社会之间的藩篱,推动了高等教育开放和革新,促进了学习者学习时间延续和自身知识不断更迭,使高等教育系统内外的学习者都有学习终身化的机遇。

三、高等教育数智化的实现路径

数智化是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是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和人才强国的重要战略。实现高等教育数智化,需要坚持人本化、开放化、智慧化和终身化的价值导向,着力教育教学资源及人才培养模式改革。

(一) 坚持以人为本,提升师生数智素养

人是高等教育的中心,数智化赋能高等教育发展,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原则,践行人文化的价值取向。

一方面,高等教育改革要坚持以生为本,提升学生的数智素质。学生是高等教育系统的学习者,面对高等教育数智化转型应主动求变,提升数智技术的个性化培养成效。在思想观念上,学生应该积极拥抱数智技术,转变传统的被动学习思维,主动认识并利用先进技术在专业知识获取方面的优势[18]28;明确自身在学习上的主体地位和主控角色,增强自我效能感,正确利用数智技术,防止陷入技术便利织造的“数字温床”,保持对技术的绝对使用权,充分发挥自我创新创造意识,理性认知拒绝受技术“奴役”而沦为“科技附庸”;在利用智能技术追求兴趣和个性发展的同时,自我提醒并增强对他类信息的敏感性和捕捉力,避免因大数据的计算、分析和智能化推送而掉入信息茧房。在行为实践上,学生可以先通过个人摸索参加相关的技能培训课程或活动来增强自己的数字素养和能力,而后利用智能技术对自身个性、兴趣、能力、目标等进行准确的检测、判断和评估,进而预测并制定个性化学习计划和培养方案,以供学生进行参考。

另一方面,高等教育改革要坚持以师为本,提升教师的数智素质。教师是知识与技能传授者,面对高等教育的数智化转型应积极应变,推动数智化赋能自身培育人才。在意识层面,教师应转变传统的教学思维和模式,有意识地推动教学过程的去权威化和去中心化,帮助学生增强主体意识,从“要我学”转化为“我想学,我要学”,促进学生成为自己学习的“主人”;教师也应正确辨识技术利用的利弊,积极提升对数字技术的认识,准确把控数字使用的分寸和尺度,防止对科技过度依赖而丢失教学的艺术和灵魂,但同时也要谨防保守看待技术的先进和优势而故步自封。在实际行动中,教师应当坚持立德树人,利用数智科技引导学生的情感与态度,采取人文关怀、言传身教等途径引领学生的价值取向,帮助学生塑造正确的道德品行,从而更好推进社会化进程并实现理想信念[18]29。

（二）搭建教学平台，促进资源开放共享

搭建形式多样的数智化教学平台，推动教学资源的互联共享，有助于更大程度地满足学习者的学习需求，提高教学质量。

首先是加强优质教学资源的数智化互联。高校要注重数智资源的建设工作，加强各个学科之间的横向联系，完善升级与各学科相配套的在线课程、教学视频、电子教材、多媒体课件等教学资源[19]，使教学资源更加丰富多样，同时做好数字资源的更新和管理工作，为学习者提供时效性强、真实可靠、全面完整的学习资源。另一方面，高校与高校之间应该秉持“合作共赢”理念，相互开放、协力扶助、共享优质教学资源，并借助数智技术，推动各方名师优生线上的交互“流动”，从而共同打造互惠互利、规模庞大的数字化教学资源库。

其次是构造智能化教学资源共享平台。各地政府是数智资源建设的投资主体，应该加大财政支持力度，与各高校之间进行合作，推动政府和高校合力设计并搭建教学资源与信息的共享平台，为学习者寻找资源提供便利条件。高校是数智资源建设的执行主体，应该形成校校之间、校企之间的信息互享机制，从而打破校校、校企间的资源与信息隔阂，消除信息不对称，既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学习者日益增长的高等教育需求同不平衡不充分的教学资源供给之间的矛盾，同时也便于高校针对企业需求，更好地培养人才的素养和技能，推动高校毕业生和社会职业要求有机衔接，减少人才资源贬值和浪费。企业是数智资源建设的参与主体，应遵循政策导向，积极主动为平台建设和完善提供资金或技术支持，履行其社会责任。

最后是完善数智教学资源的信息安全保障。政府部门应该加强高等教育数智化转型的伦理制度建设，通过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规章制度或者校本条例，严格资源共享平台的准入机制和标准，最大程度规避校企信息的泄漏、相关数据的篡改及算法歧视的风险，继而营造安全、可靠、可信的信息生态[20]。

（三）升级智能设施，提升课堂教学品质

良好的智能设施是实现高等教育数智化的重要保障，也是提高课堂教学品质的基本条件。高校数智化转型要借助新一代数智技术，优化升级高校教学设施，打造新型智慧空间，推动课堂教学质量和效率的大幅提升。

从高校方面来看，作为高等教育的组织者和承载体，应当率先积极引入数智技术，营造智能校园的数字氛围，为智慧教学活动的开展创设先发条件。一方面，高校要“做数智化教

学空间的建设者”[18]29,通过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新兴技术打造虚实融合的教学环境,推动传统教学空间的转化升级,尤其是除了服务实践应用性较强的理工农医林等专业外,还应扩大仿真课堂的泽被范围,将同类情景化课堂应用于人文社科领域的教学,例如历史学专业,可以通过利用虚拟仿真技术,为学生重现历史图像和场景,使学生身临其境、体悟学习,甚至直接与历史人物对话,以便深化对所学知识的理解和践用,增强知识获得的科技感和体验感,同时也能够推动实现学科之间的科技平等赋能,总体提升高等教育事业发展的智能化水平。

从政府层面来看,政府作为政策制定者,应主动履行职能,保障高校智能教学软硬件的完备供给。一方面,政府部门应该颁布出台利校数智化升级的政策文件,引导高校形成教学、治校的数智化意识,具备转型“软件”,鼓励高校采取措施实施转型;另一方面,政府部门应加大对高校智慧建造的财政帮扶,为高校的数智化教学倾注足够的资金援力,为其购置教学“硬件”提供支持。另外,技术研发企业也应积极参与高校智慧化建设,特别是提供技术和设备资源。

(四) 积极创设条件, 促进全民终身学习

大学是终身学习的殿堂,数智化为全体社会成员终身学习打开方便之门。迎接数字文明新时代的到来,高等教育各主体要积极转变观念,为更多学习者接受终身学习提供有利条件,形成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良好社会风气。

在思想观念层面,无论是终身学习的供给侧还是需求侧都要转变传统观念,树立借助现代智能技术开展终身教育、终身学习的理念。为营造和谐持续的学习氛围,政府应该加大政策指引,扩大宣传,从国家顶层打造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时代环境,营造智能技术与现代生活紧密结合的氛围,实现先进学习理念的耳濡目染、潜移默化;学习者个人也要紧跟时代步伐,顺应时代潮流,主动求变,尤其是高校学生更要建立对终身学习的积极看法和美好愿景,为未来的终身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在实践行动方面,作为终身学习的条件供给方,政府、学校和企业需协同合作,为全民打造终身学习的数智生态和空间,推动传统的物理空间包括教室、实验室等正式学习空间,以及图书馆、自习室等非正式学习空间[21],同数智技术支撑的云中虚拟空间相结合,实现未来学习空间的数智化转变;同时,相关部门和高校也应针对终身学习的课程与专业认证、学历学位认证和职业发展认证等设立科学合理的标准和条件,从而保障学习者的学习成效和社

会认可。作为终身学习的条件使用方,高校内外学习者要根据自身发展规划和职业需要,充分利用已有的资源和设施,最大程度地实现自我认知和能力的提升,为未来的职业变动和生活增质做准备。

四、结语

数智化赋能高等教育是必然的时代选择,也是必经的历史道路。顺应高等教育数智化转型潮流,保障实现重大的时代价值,纵深推进转型升级的可行路径,对促进高等教育的高质量发展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本文期望能够为新时代数智化转型赋能高等教育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指导和实践参考。

参考文献

- [1] 雅思贝尔斯.大学之理念[M].邱立波,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78.
- [2]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人民日报,2022-10-26(1).
- [3]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EB/OL].(2023-02-27)[2023-11-03].https://www.gov.cn/xinwen/2023-02/27/content_5743484.htm.
- [4] 王兴宇.数字化转型与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耦合逻辑与实现路径[J].社会科学战线,2023(1).
- [5] 刘国斌,祁伯洋.县域城镇数智化与信息化融合发展研究[J].情报科学,2022(3).
- [6] 王秉.何为数智:数智概念的多重含义研究[J].情报杂志,2023(7).
- [7] 石中英.教育强国:概念辨析、历史脉络与路径方法:学习领会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有关教育强国建设的重要论述[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23(1).
- [8] 吴岩.打造引领世界高等教育数字化发展风向标:《无限的可能:世界高等教育数字化发展报告》序言一[J].中国教育信息化,2023(1).
- [9] 世界慕课与在线教育联盟秘书处.高等教育数字化的趋势、阶段与变革:《无限的可能:世界高等教育数字化发展报告》节选一[J].中国教育信息化,2023(1).
- [10] 史秋衡,常静艳.人工智能赋能高质量高等教育的战略特征与制度建构[J].西安交通

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3).

- [11] 杨克勤.我国推进人才强国战略的问题与对策研究[D].锦州:渤海大学, 2018:10.
- [12] 熊思东.数智时代高等教育新形态[J].教育研究, 2020(5).
- [13] 王博.数智化转型助推大学教育高质量发展[N].中国青年报, 2023-02-20(5).
- [14] 余胜泉.智能时代的未来教育愿景[J].人民论坛·学术前沿, 2023(18).
- [15] 陈林.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的价值功能、现实风险及优化路径[J].当代教育论坛, 2023(3).
- [16] 朱旭东.集体性个人学习:中国教室里发生的独特学习[J].课程·教材·教法, 2020(2).
- [17] 世界慕课与在线教育联盟秘书处.高等教育数字化愿景目标与行动倡议:《无限的可能:世界高等教育数字化发展报告》节选七[J].中国教育信息化, 2023(1).
- [18] 张志华, 孙嘉宝, 季凯.“变”与“不变”:高等教育数智化转型的趋向、风险与路径[J].高校教育管理, 2022(6).
- [19] 侯君, 李千目.信息技术与治理双向赋能高校教学:从填平“数字鸿沟”到补齐高质量发展“短板”[J].中国大学教学, 2022(5).
- [20] 陈林.数字化转型赋能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价值机理与推进策略[J].教育学术月刊, 2023(8).
- [21] 胡钦太, 危妙, 陈颖珊.高等教育数字化:演进、挑战与转型[J].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 2023(4).

(《三峡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5期)

数字时代重申文科教育的重要价值 | 郭成 王建华

摘要:“文科无用论”的热议并不是人类对技术万能论的支持和信任,相反,是人类对知识爆炸和技术进步的数字时代带来的意义内容泛化、手段简化和环境窄化的意义丧失之困的反思和失信。在这一背景下,文科教育以其对学生想象力、自反力和理解力的培养来重新建构人类社会和人类自身的意义价值,重申其作为有用性的目的本身和创造源泉的实践活动

的重要地位。文科教育的价值是固有的，然而并不因其自身重要而始终备受重视。为了实现其价值的可持续性，文科教育需要主动超越原有教育模式，适应和利用混合现实与人工智能等前沿数字技术的发展优势，实现文科教育长久之用的可能性。

关键词：数字时代；文科教育；价值；超越

郭成,王建华. 数字时代重申文科教育的重要价值 [J]. 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 2025, (4): 85-95.

(《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25 年第 4 期)

生成式人工智能视域下高校文科教学的伴生性风险与防范 | 金华 王汉英

摘要：伴随人工智能的迅猛发展，生成式人工智能（AIGC）成为驱动教育变革的革命性力量。尤其是在高校文科教学中，AIGC 凭借其个性化的学习路径、敏捷的资源整合能力、多模态的场景再现，在教学主体能力重塑、教学内容适配和教学效能提升方面表现出独特优势，显著提高知识生产的速度与质量。AIGC 在推动教学过程由人师-机师、人思-机输、综评-机评的切换过程中，也面临着高等教育主权削弱、主体知识思维堕化和人才培养异化等伴生性风险。面对这些挑战，高校文科教育教学亟须进行风险防范与前置治理。第一，重塑文科培养目标，调整文科培养方案；第二，优化文科生核心素养，重构培养体系；第三，推进教师角色转型，引领人机协同教学新范式；第四，构建文科培养的多维评价体系，保障教学质量。在智能革命时代，高校文科教学既要积极探索与 AIGC 融合的新路径，又要警惕 AIGC 过度依赖对教育本质的侵蚀。

关键词：生成式人工智能；高校文科教学；伴生性风险；防范

(《黑龙江高教研究》2025 年第 5 期)

智能体赋能高等教育变革：基于 DeepSeek-R1 的范式重构与“浙大先生”实践探索 | 陈默 杨玉辉 杨清元 等

摘要：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飞速发展，以 DeepSeek-R1 为代表的推理模型为高等教育

变革注入了新动力。在此背景下，文章首先梳理了从单一智能体到多智能体协同的技术演进历程，并分析了智能体赋能高等教育变革的可能场景与潜在优势，发现多智能体协同通过技术整合与策略优化，能够有效弥补单一智能体在面对复杂多变的教育场景时的局限性，实现教育场景中的复杂任务处理。之后，文章以“浙大先生”智能体平台为例，开展了多智能体协同的高等教育实践，并阐释了其在教育、科研、治理等场景进行的实践创新。最后，文章围绕“如何利用多智能体系统推动高等教育改革”的问题提出建议，以为智能体赋能高等教育变革提供参考，并推动新质人才培养，助力实现高等教育的可持续、高质量发展。

关键词：DeepSeek；智能体；高等教育；人工智能赋能；多智能体协作

（《现代教育技术》2025年第5期）

从“AI 排斥”到“AI 创能”：人工智能在大学教学中的应用深化 | 黄巨臣 王一栋

摘要：促进人工智能在大学教学中的应用深化是当前中国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面临的重要议题，迫切需要深入探讨。基于此，从“AI 排斥”转为“AI 创能”视角切入，在厘清“AI 排斥”与“AI 创能”概念基础上，揭示“AI 排斥”具体表现为思想排斥、制度排斥、组织排斥与知识排斥，发现其遵循认知观念、政策体系、组织系统、知识传授等因素在内的多种生成逻辑。作为对“AI 排斥”现实困境的回应，“AI 创能”在观念、制度、组织以及知识四个维度上推进了范式转变创新。为消除“排斥”，实现“创能”，尝试提出“创新理念+创设制度+创生组织+创变情境”四位一体联动式行动路径，以深化人工智能在大学教学中的应用。

关键词：“AI 排斥”；“AI 创能”；人工智能；大学教学；应用深化

（《中国高教研究》2025年第4期）

中国交叉学科：发展脉络、基本特征与建设策略 | 钱佳 黄启兵 田晓明

摘要：学科交叉与学科分化一样，是学科发展历史的必然趋势。我国对学科交叉问题的认识起步较晚。民国时期少数学者开始关注学科交叉问题；新中国成立之后的17年全面照

搬苏联发展模式，交叉学科没有得到充分发展；改革开放以降，学科交叉得到学术界和政府的密切关注和高度重视。基于 3 个历史阶段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交叉学科发展历史的全面梳理，研究发现，我国交叉学科建设与发展具有 3 个基本特征：一是尊重学术发展内在规律；二是以国家战略需求为导向；三是彰显稳健、持续、灵活的中国特色。针对交叉学科建设和发展过程中所存在的若干现实问题，我们提出了有效平衡激进与保守之间的学科认知、建立健全学界与政府之间的互动机制和妥善处理内容与形式之间的辩证关系 3 个应对策略。

关键词：学科建设；学科发展；学科交叉；交叉学科

（《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5 年第 2 期）

他山之石

重塑英格兰高等教育生态系统：整合、灵活性与协作式可持续发展 |

[英] 马克·莫林

阅读提示：2025 年 4 月 29 日，终身教育研究院（Lifelong Education Institute）举办 2025 年终身学习（Lifelong Learning 2025）年会。年会的主题之一是“英格兰高等教育的未来（The Future of Higher Education in England）”，作者是小组专题研讨主持人。本文即基于年会研讨成果，聚焦英格兰高等教育改革的战略方向与实践路径。作者是终身教育研究院研究负责人。

面对日益加剧的财政压力、劳动力市场需求转变以及学习者期望的演变，英格兰高等教育亟需系统性改革。近期在终身教育研究院年会上的专家讨论指出，未来高等教育体系需通过机构协作、终身学习机制重构及资金模式创新，构建更具适应性、包容性和可持续性的教育生态。

跨部门整合与战略协作

专家强调，打破继续教育与高等教育间的壁垒，并深化教育机构、行业及区域间的协作是关键。例如，曼彻斯特大学与剑桥大学的跨区域合作推动了创新型“探路者”模式；安格利亚鲁斯金大学与国民医疗服务体系（NHS）及警方的合作则定制了契合行业需求的学位学徒计划。此类案例表明，通过整合资源与专业能力，教育机构可提供符合区域发展战略和国家生产力目标的连贯资格认证体系，减少重复投入与恶性竞争。

贯通终身学习链条

与会者指出,需弥合基础教育与高等教育间的脱节。高等教育政策研究所(HEPI)所长尼克·希尔曼呼吁高校积极参与“弗朗西斯学校课程与评估审查”,优化学生升学路径。同时,旨在支持终身技能更新的“终身学习权利(Lifelong Learning Entitlement)”因文化障碍、市场数据缺失及财务风险未能充分发挥潜力。安格利亚鲁斯金大学的克莱尔·派克提出,高校需推广模块化灵活课程,辅以职业指导与针对低收入群体的信心建设计划,以激活“终身学习权利”的价值。

模块化学习与灵活路径

伦敦南岸大学(LSBU)校长大卫·菲尼克斯强调,高等教育需摆脱固定学制的资金绑定。伦敦南岸大学的“门户学院-专科院校-大学”三级体系允许学生通过阶段性资格认证(从3级至研究生水平)渐进学习,支持“暂停-重返”式教育模式。模块化课程设计(如4级或5级出口资格)不仅适应职业中断者的需求,也为频繁转换赛道的“组合型职业”人群提供再技能化通道。为此,高校需构建可扩展的中央支持系统,确保线上线下及职场嵌入式教学的质量一致性。

专业化分工与体系效能优化

借鉴德国与加拿大的经验,英格兰需强化中高级技术资格(4-5级)的衔接性,明确教育机构的分工定位:门户学院负责基础技能培养,技术学院聚焦职业专长,大学则专攻学术研究及高阶课程。尽管政府新建10所建筑技术类学院的计划值得肯定,但缺乏整体协同愿景可能加剧体系碎片化。专家建议,通过国家、区域和地方三级分工,形成差异化供给网络,避免资源重复。

三元资金模型与问责机制革新

可持续资金需由政府、雇主与个人合理分摊。改革提案包括恢复学生贷款实际利率、学费与通胀挂钩浮动,以及通过税收激励或共担计划鼓励企业投资员工培训。与此同时,现行问责指标(如辍学率与毕业生就业结果)因忽视学生背景差异而加剧院校同质化倾向。专家呼吁采用“量化-质性结合”的评估框架,例如增设模块化课程完成率、社会流动性成效等维度,以更公平地衡量院校贡献。

构建适应性教育生态

英格兰高等教育的未来取决于三项核心变革:一是通过跨部门协作与区域联盟打造整合式教育网络;二是以模块化、终身学习为核心重构教学供给;三是建立公平且可持续的资金与评估体系。在此过程中,高校需主动扮演“区域创新引擎”角色,聚焦特色优势领域,为

学习者提供灵活、连贯的技能增值路径。唯有通过系统性创新，高等教育才能有效应对全球挑战，支撑经济长期增长与社会包容目标。

（来源：继续教育新闻（FE News）官网）

国际视域下交叉学科博士生培养：困境、纾困与启迪 | 闫广芬 杜剑涛

摘要：培养交叉学科博士生是全球研究生教育改革的重要趋势。在国际比较视野下，国外交叉学科博士生培养在资源筹集、组织协同、导师联合指导、学生自我认同和评价变革等方面存在困难。各国通过多途径筹集项目资源、创新学科交叉组织体系、落实导师联合指导制度、全方位提升学生自我认同和推动交叉评价体系改革等举措，促进交叉学科博士生培养的持续性、协同性、合作化、社会化和科学性，为我国提供良好镜鉴。

关键词：交叉学科；交叉学科博士生；博士生培养

（《研究生教育研究》2025年第1期）

向数字契约迈进：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推动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的价值理念、行动机制与实践经验 | 阚阅 刘林佳

摘要：为应对全球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需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以“数字契约”为核心的转型框架，展现出一种典型的复杂适应系统特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立足于人文主义与社会契约的治理观念、借助全球报告与新兴概念推进思想实验，并以区域化与本土化布局形成合作边界。通过在全球机制复合体中引领政策战略、在多元利益相关方中创新转型生态、在高等教育权力格局中促进资源流动等举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全球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成效内化于高等教育系统的职能使命与管理效率之中。尽管面临全球教育与技术格局的复杂张力，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依然坚持以人为本、全面且可持续的转型路径，为我国参与构建开放、协同、高质量与可持续发展导向的全球高等教育数字化生态提供了重要借鉴。

关键词：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球数字契约；复杂适应系统

（《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25年第3期）

增进高等教育机构的数字福祉:英国数字能力框架研究 | 阚阅 卢宇

峰

摘要: 面对数字社会转型的外部压力和高等教育创新发展的内在要求,英国联合信息系统委员会推出以增进数字福祉为核心的“数字能力框架”。该框架从个人发展和组织支持两个方面阐述了提升高等教育机构内学生、教师、管理人员等群体数字能力的专业方案。为有效提升高等教育机构整体数字能力建设,英国联合信息系统委员会充分发挥专业发展标准与数字能力框架的协同发展作用,将数字能力培养活动融入高等教育机构的教学活动和行政管理。综观英国数字能力框架的出台与实施,可以发现其具有鲜明的特征,既关注所有人的成长需求,也重视利益相关者的个性化需求。数字变革进程中提升数字能力,需要重新审视技术与人的关系,重新思考技术与教育的融合。

关键词: 英国; 高等教育机构; 数字福祉; 数字能力框架

(《中国高教研究》2025年第5期)

日本数字人文教育的经验与启示研究 | 石亮亮

摘要: 数字人文教育已成为世界各国高等教育改革的前沿阵地。日本作为亚洲最早开展数字人文研究与教学的国家,经过30余年发展,构建了较为完善的教育体系,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在梳理日本数字人文发展脉络的基础上,围绕高校人才培养、教学组织、师资建设、学术评价等维度,考察其教育实践模式,并结合我国学科发展现状,探讨对我国数字人文教育的启示和建议,旨在为培养新时代创新型文科人才提供坚实支撑,为推进文化自信和实现教育强国贡献智慧力量。

关键词: 日本; 数字人文教育; 人才培养; 经验借鉴; 跨学科发展

(《山西档案》2024年第5期)

政策工具视角下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的路径研究——以哈萨克斯坦

为例 | 梅伟惠 马雪梅

摘要: 自2017年“数字哈萨克斯坦”国家计划发布以来,在两任总统的大力推动下,

哈萨克斯坦颁布并实施了一系列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政策。借助供给型、环境型、需求型三种政策工具，哈萨克斯坦加大了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的资金支持、人才培养、基础设施建设，完善了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法律法规、目标规划、金融服务，推进了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校企合作、示范工程打造和国际交流。鉴于哈萨克斯坦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的经验与困境，我国应以供给型政策工具为重要支撑，强化高等教育数字化政策实施的多重保障；以环境型政策工具为必要辅助，加强高等教育数字化政策规划的目标引领；以需求型政策工具为未来趋势，追求高等教育数字化政策实践的本土适配。

关键词：哈萨克斯坦；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政策工具理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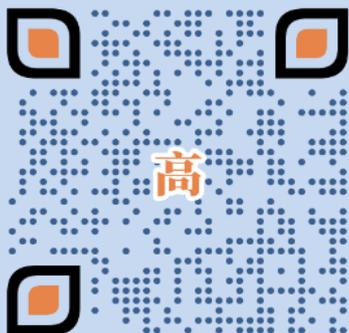
（《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25年第3期）

虚拟国际化：数字时代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新方向 | 段世飞 钱跳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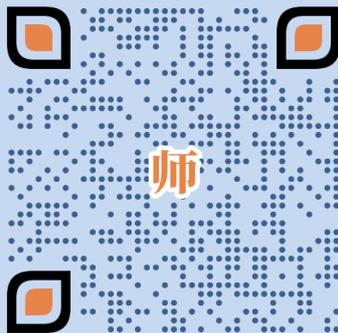
摘要：虚拟国际化已经成为数字时代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新方向。虚拟国际化包含了全球性、跨文化性和国际性三个维度，它具有不依赖跨境物理流动、丰富数字时代国际化内涵以及超越时间和空间等特征。推进高等教育虚拟国际化是数字时代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以及坚持教育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必然要求。当前我国已具备实现高等教育虚拟国际化的现实条件与坚实基础，但我国高等教育虚拟国际化发展仍在理念、现实、制度以及秩序方面面临困境。因此，加速高等教育虚拟国际化的认识转变，加快高等教育虚拟国际化的技术推广，加强高等教育虚拟国际化的制度供给以及加紧高等教育虚拟国际化的话语构建将是未来我国高等教育虚拟国际化发展的主要路径。

关键词：数字时代；高等教育数字化；高等教育国际化；虚拟国际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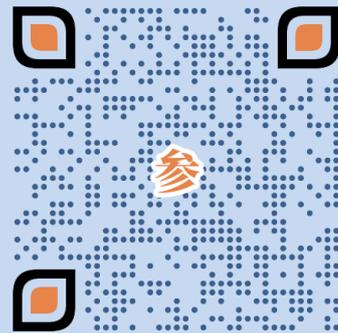
（《苏州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24年第5期）



高等教育研究所



教师教育专题信息



高教决策参考

高教决策参考
2025年第12期
第2卷第12期·总第23期
2025年5月23日发布

上海师范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
200234 上海市桂林路100号
徐汇校区西部计算中心2楼
<https://ghc.shnu.edu.cn>